

[美] 赫伯特·布鲁默

## 论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

“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已经被人们当作一个标签来使用,表示对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方法。<sup>①</sup>许多学者都运用过这种方法,其中包括下面这些著名的美国学者:乔治·H. 米德、约翰·杜威、W. I. 托马斯、罗伯特·E. 帕克、威廉·詹姆斯、查尔斯·H. 库利、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詹姆斯·M. 鲍德温、罗伯特·拉德菲尔德以及刘易斯·沃思。这些学者虽然在思想上有种种重要差别,但是,他们在观察和研究人类群体生活时所使用的一般方法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符号互动论的概念就是围绕着这种相似性构成的思想线索确定的。对符号互动论的清楚的系统表述迄今尚未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缺少对这种研究的方法论进行的有理有据的陈述。本文是为展示这样一种陈述所作的努力。我主要依据乔治·H. 米德的思想,他在给符号互动论方法奠定基础方面做的工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但是,我也一直强迫自己系统展示我自己的观点:明确论述只是潜在地存在于米德以及其他人的思想之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

---

\* 选自 Herbert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第1—60页。

① “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是我在一篇论文中以一种即兴创作的方式创造的一个多少有点不规范的新词,该文载于《人与社会》(Emerson P. Schmidt 编, New York, 1937)。这个术语不知怎样就流行起来,现在已经成为通用语。

问题,并且论及他们都未曾涉及过的其他各种重要论题。因此,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对这里提出的观点和分析负全部责任。就我对方法论的论述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对这个论题的讨论完全出于我自己的观点。我的论述方案是,先概括叙述符号互动论的本质内容,然后就经验科学而言鉴别那些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最后专门论述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取向。

### 符号互动论的本质内容

符号互动论归根结底基于三个简单的前提。第一个前提: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的。这些事物包括人在其世界中所可能注意到的每一种东西——物理客体,诸如树木或者桌椅;其他人,如一位母亲或者一位商店职员;各种各样的关于人的范畴,如朋友或敌人;各种制度,如一所学校或者一个政府;各种引导人们行为的理想,如个人独立或者诚实;其他人的活动,诸如他们的指令或者请求;以及人作为一个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情境。第二个前提:这些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互动中衍生或者产生出来的。第三个前提:在这个人与他所遇到的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过程而驾驭并修正这些事物的意义。我希望简明扼要地逐一讨论这三个基本前提。

几乎没有什么学者会认为第一个前提——即人们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有问题。然而,说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当代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所有思想和研究工作中,如此简单的观点实际上都受到了忽视或者贬低。人们要么认为意义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进而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搁置一旁;要么认为它仅仅是某种中性的环节——连接那些能够说明人类行为之各种因素,并把人类行为视作这些因素之产物。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势态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两个

研究领域所共同具有的是这样一种倾向：把人类行为当作影响人们的各种各样因素的产物，所关注的只是行为和被认为导致行为发生的各种因素。这样，心理学家们就致力于研究下列这些因素：刺激、态度、有意识的动机和无意识的动机、各种各样的心理输入 (psychological inputs)、知觉和认识以及人格组织的各种特征，以此说明人类行为的各种既定形式或者事例。社会学家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依靠诸如社会位置、地位欲求 (status demands)、社会角色、文化习性 (cultural prescriptions)、规范和价值、社会压力以及群体归属关系 (affiliation) 这样一些因素来对人类行为作出同类性质的解释。在这两种典型的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中，事物对于正在进行活动的人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要么被忽视了，要么被用来说明他们行为的各种因素而被吞没了。如果有人宣称，这些既定的行为类型都是那些被视为引发它们产生的各种特定因素的结果，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说自己所关注的是人们进行活动所针对的事物所具有的意义，而只需要识别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和由它们导致的行为就可以了。也许有人为其情境所迫，会试图通过把意义置于具有引发作用的各种因素之中，或者通过把意义视为在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和据说由它们引发的行为中间发挥调节作用的中性环节，来对这种意义成份予以考虑。在后面这些情况的第一种情况下，意义由于被融合进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或者作为原因的因素之中而消失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意义则变成了一种单纯发挥传导作用的环节——人们可以为了强调这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而忽略意义。

相形之下，符号互动论的原则是，事物对于人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无视人们针对其进行活动的事物所具有的意义，就是对正在被研究的行为的歪曲。为了突出那些据说导致行为发生的因素而忽视意义本身，是对意义在行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严重忽视。

人们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这个简单前提本身是太平常了，它无法使符号互动论区别于其

他方法取向——还有另外几种方法也坚持这个前提。把它们与符号互动论区别开来的一条主要线索是由第二个前提确定的,后者所指涉的是意义的源泉。对意义起源的说明有两种非常著名的传统方式。其中一种方式认为,意义是具有意义的事物所内在固有的东西,是这种事物之客观构造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因此,一把椅子显然本质上就是一把椅子,一头母牛本质上就是一头母牛,一朵白云本质上就是一朵白云,一次起义本质上就是一次起义,等等。由于意义是具有意义的事物所内在固有的东西,所以人们只需要通过观察具有意义的客观事物,把它分离出来就可以了。据说,这种意义是从这种事物中散发出来的,因此,它的形成不包含任何过程;人们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认出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意义而已。这种观点反映了哲学中传统的“实在论”立场——这是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且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之中的立场。另一种传统观点认为,“意义”是由一个人赋予事物——这种事物对于他来说具有意义——的一种心理添加物(psychical accretion)。这种心理添加物被当作对这个人的精神(psyche)、心灵或者心理组织之诸构成成份的一种表达。而这些构成成份就是诸如感觉、感情、观念、记忆、动机以及态度这样一些东西。一个事物的意义只不过是对于对这个事物的知觉有关而被调动起来的、各种既定的心理成份的表达;因此,有人试图通过把产生这种意义的各种特殊心理成份分离出来,来说明一个事物的意义。在通过识别已经进入对一个客体的知觉之中的各种感觉而分析这个客体的意义的、多少有些古老和经典色彩的心理学实践中,或者在把事物的意义——例如,让我们以卖淫为例——追溯到观察这种事物的人的态度的当代研究实践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把事物的意义置于各种心理成份之中的做法,把意义的形成过程局限于唤起和汇集产生这种意义的各种既定心理成份所涉及的任何一种过程。这些过程本质上都是心理过程,包括知觉、认识、抑制、感情转移以及联想。

符号互动论认为,意义的源泉与我们刚刚考察过的这两种处于

支配地位的观点不同。它既不认为意义是从具有意义的事物之内在固有的构造中散发出来的,也不认为意义是通过人的各种心理成份的结合产生的。与这些观点不同,符号互动论认为意义是在人们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事物对于一个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是从其他人就这个事物而针对这个人所进行的活动的诸种方式中产生的。正是他们的行动为这个人界定了这个事物。因此,符号互动论认为意义是社会的产物,是在人们互动时通过他们的界定活动而形成的创造物。这种观点使符号互动论具备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倾向,后者具有我们后面还要讨论的意味深长的涵义。

上面提到的第三个前提进一步把符号互动论与其他方法区别开来。虽然事物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脉络中形成、是由个人从这种互动中产生出来的,但是,认为一个人对意义的使用只不过是对如此产生出来的意义的应用却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严重损害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如果不犯这种错误,他们本来是会遵循符号互动论的研究方法的。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其行动中对意义的使用包含着一个解释过程。就这个方面而言,他们与上面谈到的那两种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的拥护者——与那些把意义置于具有意义的事物本身的客观构造之中,以及那些认为意义是对各种心理成份的一种表达的人——并无二致。就认为个人在其行动中对意义的使用只不过是对已经确立的意义的唤起和应用而言,所有这三种人观点都一样。因此,这三种人没有看到,行动者对意义的使用是通过一个解释过程而发生的。这种过程有两个明确的步骤。首先,行动者对自己指出他正在进行的活动所针对的事物;他必须对自己指出那些具有意义的事物。这是一种内化的社会过程,因为行动者是在与自己互动。这种与自己的互动与各种心理成份的相互影响不同;它是有关个人参与与自己沟通的过程的一个例证。其次,正是由于这种与自己沟通的过程,解释就变成了一个如何对待意义的问题。行动者根据他被置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选择、审度、搁置、重组、转化各种意义。所以,不应当认为解释仅仅是对已经确立的意义的自动应用,而应当认为它

是一个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把意义当作指导和形成行动的工具来使用和修正。必须看到的是,意义在行动中是通过一个自我互动(self interaction)过程发挥作用的。

在这里,我的目的既不是讨论分别把意义置于事物之中、置于心理之中以及置于社会行动之中这三种观点的长短,也不是详细阐述下列主张,即行动者在形成其行动的过程中灵活地对待各种意义。与这些目的不同,我只希望指出,只要把符号互动论建立在这三个前提之上,就必然会使它发展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分析方案。我现在所要概括论述的正是这种方案。

符号互动论建立在一些基本观念或者——正像我倾向于称呼它们的那样——“根本意象”(root images)之上。这些根本意象指涉并且描述下列问题的本质内容:人类群体或者社会,社会互动,各种客体,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行动,以及行动线索的相互联系。这些根本意象共同表明了符号互动论观察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所特有的方式。它们构成了分析和研究的框架。让我简明扼要地逐一描述这些根本意象。

#### 人类社会或者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内容

人类群体被认为是由参与行动的人们组成的。行动由个体在其生活中相互遭遇或者应付他们面对的接连出现的情境时所进行的大量活动组成。这些个体可能单独活动,可能集体活动,也可能以由其他人构成的某种组织抑或群体的名义、或者代表这种组织抑或群体而活动。这些活动都属于进行活动的个体,并且总是由他们就他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情境而进行的。这种简单而实质上丰富的特性的含义在于,从根本上说,人类群体或者社会存在于行动之中,必须根据行动来观察它们。对于试图从经验角度对待和分析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研究来说,这种把人类社会描述成行动的做法都必定是发出点(而且也是归宿)。以某种其他的方式描述社会的概念图式,都只能是构成群体生活的、不断进行的活动复合体(complex)的派生物。就当代社会学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两种社会观念——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观念——而言,

情况都是如此。无论人们把作为一种观念的文化界定为习惯、传统、规范、价值、规则,还是界定为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它都显然是从人们的所做所为中产生出来。同样,就其由诸如社会位置、地位、角色、权威以及声望这样一些术语表示的任何一个方面而言,社会结构都指涉来源于人们相互针对对方进行活动的方式的关系。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生活,都必然是由不断进行的、使其成员的活动相互适应的过程组成的。确立和描述结构或者组织的,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活动的复合体。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有关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具有经验取向的研究方案,无论它是怎样推导出来的,都必须尊重下列事实,即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是由参与行动的人组成的。一个研究方案要想在经验上有效,它就必须与人们社会行动的本质内容相一致。

#### 社会互动的本质内容。

群体生活必然预设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或者换一种方式说,一个社会是由相互之间进行互动的个体组成的。这些成员的活动主要是在相互作出的反应中或者在相互关系中发生的。虽然这一点在人们对人类社会作出各种界定的过程中几乎得到了普遍承认,但是,人们通常还是认为社会互动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且把它当作本身即使有意义也意义不大的东西来对待。这一点在典型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案中是很明显的——它们都只把社会互动当作一种中介物(medium)来研究论述:通过这种中介物,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就开始导致这种行为发生。因此,这种典型的社会学研究方案认为行为是由诸如地位位置(status position)、文化习性、规范、价值、制裁、角色欲求以及社会体系要求这样一些因素引起的;人们满足于根据这些因素作出说明,而没有对这些因素的发挥作用所必然要预设的社会互动给予重视。同样,就典型的心理学研究方案而言,人们也是使用诸如动机、态度、隐藏在内心的情结、心理组成成份以及心理过程这样一些因素去对行为加以说明,而不认为有必要考虑社会互动。人们从这些作为原因的因素跳跃到据说是由这些因素产生的行为上去。社会互动仅仅变成了一种场所(forum)——通过这种场所,社会学或

者心理学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就产生出既定的人类行为形式。我还要补充的是,无论是谈论社会成份的互动(就像一个社会学家在谈论社会角色互动或者社会体系诸组成部分的互动时所做的那样),还是谈论心理成份的互动(就像一个心理学家在谈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的互动时所做的那样),都不能纠正这种对社会互动的忽视。社会互动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不是被转嫁给他们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

符号互动论并不仅仅郑重地承认社会互动的存在。它还认为社会互动本身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意义存在于下列事实之中,即社会互动是一种形成人类行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用于表达或者释放人类行为的手段或者环境。简而言之,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必须互相考虑对方正在做什么或者将要做什么;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所考虑的东西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者对待他们的情境。因此,其他人的活动便作为积极因素进入了他们自己的行为的形成过程;面对其他人的行动,一个人可能放弃一种意向或者企图,修改它、审视或者搁置它、强化它、甚至替换它。进入一个人行为的形成过程并且确定他计划要做的事情的其他人的行动,可能会与他的这些计划相反或者阻碍他实施这些计划,可能会要求他修改这些计划,也可能要求他重新作出一套与原有计划大相径庭的计划。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他自己的活动线索适合其他人的行动。他必须考虑其他人的行动,而不能仅仅把这些行动视为一个用来表达他打算要做或者开始做的事情的场所(arena)。

我们要感谢乔治·H. 米德,因为他对社会互动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这种分析完全可以和我们刚才叙述的实在论解释平分秋色。米德识别了人类社会中社会互动的两种形式或者两种层次。他把它们分别称为“姿态对话”(the conversation of gestures)和“使用有意味的符号”(the use of significant symbols);我将把它们分别称为“非符号互动”(non-symbolic interaction)和“符号互动”。当一个人直接对另一个人的行动作出反应、而不对这种行动加以解释时,出现的就是



非符号互动;符号互动则包含着对这种行动的解释。在各种反射性反应中最容易看到非符号互动——就像人们在一个拳击家自动抬起胳膊抵挡打击时所看到的那样。然而,如果这个拳击家从反思的角度把这次即将由他的对手进行的打击识别为对手为了欺骗他而做的假动作,那么,他所参与的就是符号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努力确定这次打击的意义——也就是说,就他的对手的计划而言,这次打击意味着什么。当人们在其联合体(association)中对彼此的身体运动、表情以及语调作出直接的、未经反思的反应时,他们所大量参与的是非符号互动;但是,当他们试图理解彼此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时,他们那富有特色的互动方式则处在符号互动层次上。

米德对符号互动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符号互动既是对各种姿态的展现(presentation),也是对这些姿态的意义作出的反应。姿态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动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而这种行动则指示它作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的更大的活动——例如,晃动拳头表示有可能进行攻击,而一个国家的宣战则表示这个国家的行动态度和行动路线。诸如要求、命令、指令、暗示以及宣言这些东西都是姿态,作出这些姿态的个人用它们向承认它们的个人传达有关其即将进行的行动的意向和计划的观念。作出反应的个人根据这些姿态对于他来说所意味的事情组织他的反应;而作出这些姿态的个人则把它们当作有关他计划要做的事情以及有关他希望这个反应者做什么或者理解什么的指示或者指号(sign)表现出来。因此,无论对于作出这种姿态的人来说,还是就这种姿态所针对的个人而言,它都是有意义的。当这种姿态对于双方来说具有同一种意义时,这双方就达成了相互理解。从以上简短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姿态的意义是沿着三条线索产生的(这就是米德所谓意义的三位一体本质内容):它指示它所针对的人应当做什么;它指示正在作出姿态的人计划做什么;它还指示即将通过明确阐述双方的活动而开始的联合行动(joint action)。因此,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强盗命令其受害者举起双手表示:(a)这个受害者应当做什么;(b)这个强盗打算做什么,即抢劫这

个受害者的钱财；(c)正在形成的联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次拦路抢劫。如果在这三条意义线索之中的任何一条意义线索上存在混乱或者误解，那么，沟通就会失效，互动就会受到阻挠，联合行动的形成就会被阻止。

为了全面表达米德对符号互动的分析，还应当补充另外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参与这种互动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互相承担对方的角色。为了向另一个人指示他应当做什么，一个人必须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作出这种指示(indication)；为了命令受害者举起双手，强盗必须从马上就要这样做的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反应。相应地，受害者必须从发出这种命令的强盗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种命令；他必须领会强盗的意向和强盗即将采取的行动。这种互相承担角色是相互沟通和有效的符号互动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

符号互动在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社会或者人类群体是由处于联合体之中的人们组成的。这样的联合体必然以互相针对对方进行活动的形式、并且因而以参与社会互动的人们的形式存在。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互动在符号层次上富有特色并且处于支配地位；当那些以个人的形式、集体的形式或者以作为某种组织的代理人的形式活动的个体相互遭遇时，当他们形成他们自己的行动时，他们必然需要互相考虑对方的行动。他们通过由向其他人指出怎样活动和解释其他人作出的指示构成的双向过程来做到这一点。人类群体生活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过程——由向其他人这样作出应当做什么的界定的过程和解释他们的界定的过程组成。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开始使他们的活动互相适应，并且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个体行为。无论是联合活动还是个体行为，都是在这种不断进行的过程之中、并且通过这种过程形成的；它们都既不单纯是对人们赋予其互动所具有的东西的表达或者这些东西的产物，也不单纯是对先于他们的互动而存在的各种条件的表达或者这些条件的产物。正是由于未能在自己的研究方案中引入这一关键之点，构成了那些试图根据社会组织、根据心理因素或者根据这

二者的某种组合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各种研究方案的根本缺陷。人类群体生活由于符号互动而必然是一种形成(formative)过程,而不仅仅是表达各种预先存在的因素的场所。

### 客体的本质内容

符号互动论的观点是,由于人们、由于他们的群体而存在的“各种世界”,都是由种种“客体”构成的,而且所有这些客体都是符号互动的产物。客体是某种可以由人们指示、指出或者指涉的东西——一朵白云,一本书,一个立法机构,一位银行家,一种宗教教义,一个鬼魂,诸如此类。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可以把这些客体分为三类:(a)物理客体,诸如椅子、树木或者自行车;(b)社会客体,诸如学生、教士、一位总统、一位母亲或者一位朋友;(c)抽象客体,诸如道德原则、哲学学说或者诸如正义、剥削、怜悯这样的观念。我想重复一下,客体是某种可以被人们指示或者指涉的东西。一个客体——任何一种客体——的本质内容,是由它对于把它视为客体的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构成的。这种意义确定了他观察这个客体的方式,确定了他准备针对它进行活动的方式,还确定了他准备谈论它的方式。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一个客体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位植物学家、一个伐木工人、一位诗人以及一个家庭花园园工来说,一棵树将是一个不同的客体;对于美国总统所在政党的热心成员和反对党的成员来说,美国总统可以是极为不同的客体;一个种族群体的成员可能被其他群体的成员视为一个不同的客体。从根本上说,客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来源于他与之进行互动的其他人向他界定这些客体所使用的方式。因此,我们通过其他人的指示才开始认识到一把椅子是一把椅子、医生是某种专业人员、美国宪法是一种既定的法律文献,诸如此类。普通的客体都在一个互相指示过程中显示出来——它们对于既定的一群人来说具有同一种意义,并且被他们以同一种方式观察。

从上面对客体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结论。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人们的环境或者背景(milieu)的不同的画

面。从这些既定的人的立场来看,这种环境只是由他们认识到并且了解的客体组成的。这种环境的本质内容是由组成它的客体对于这些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确定的。因此,占据或者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位置上的个体和群体可能会具有大相径庭的环境;正像我们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是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的确,就表示他们所面对的背景、周围环境以及事物的结构而言,“世界”这个术语比“环境”这个词更合适。这个由人们的客体组成的世界正是他们所不得不与之打交道并且针对其进行他们的行动的世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想理解人们的行动,就必须识别他们那由客体组成的世界——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下面还会讨论的观点。

其次,必须把客体(就它们的意义而言)视为社会的创造物——视为当人们的界定和解释过程在他们的互动中出现时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产生出来的东西。任何一种事物的意义都必须通过一个指示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一种社会过程——而得以形成、并被人们学习和传播。处于符号互动层次上的人类群体生活是一种涉及面很广的过程,当人们在这种过程中开始把意义赋予客体时,他们就是在形成、维护、转化他们的世界的客体。除非客体的意义通过人们对待这些客体所进行的界定和解释过程得到维持,否则,客体就不具有固定不变的地位。所有的客体就其意义而言都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对于一位现代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位处在产生圣经的时代的牧羊人来说,天上的星辰是极为不同的客体;对于早期罗马人和晚期罗马人来说,婚姻是极不相同的客体;一位未能成功地履行职责以使其国家度过危难时期的总统,对于他的人民来说他就可能会变成一种极为不同的客体。简而言之,从符号互动论的立场来看,人类群体生活是一个过程——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创造、肯定、转化以及被抛弃。人们的生活和行动的变化必然与他们的客体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相一致。

#### 人作为进行活动的有机体

符号互动论认识到,人们必定具有一种适合社会互动之本性的

构造(makeup)。人不仅是一种在非符号层次上对其他人作出反应的有机体,而且是一种解释其他人的指示并且向其他人作出指示的有机体。正像米德已经从经验上表明的那样,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由于他有一个“自我”。这种表述并没有任何深奥难解的东西。它所指的只不过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他自己的行动的客体。因此,他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出身于一个平常家庭、负有债务、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医生的大学生,诸如此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都是他自己的客体;而且他针对他自己进行活动,并且,根据这一对于他自己来说的客体,在他的行动中使他自己同其他人发生关系。这种有关作为客体的自己(oneself)的概念也适用于前面对客体的讨论。和其他客体一样,这种自我客体(self object)也是从社会互动过程——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向一个人界定他本人——中产生的。在讨论个体承担角色的过程中,米德曾经追溯过这种客体发生的方式。他指出,为了变成自己的客体,一个人必须从外部来看待自己。一个人只有通过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角度、并且从这种角度出发看待他自己或者针对他自己进行活动,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所承担的角色既包括分立的(discrete)个体的角色(“玩耍阶段”)、有组织的分立群体的角色(“游戏阶段”),也包括抽象的共同体的角色(“一般化的他人”)。在承担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个人处于与他自己交谈或者联系的地位——例如,一个少女在“扮演母亲”的时候会像她母亲将会做的那样与自己谈话,或者一位教士以全体教士的眼光看待他自己。通过这样一个个体承担角色的过程,我们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客体。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以其他人看待或者界定我们的方式看待我们自己——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们通过承担上面已经提到的其他人的三种角色类型中的一种角色类型来看待我们自己。在当前的文献中,有关个人通过其他人向他界定他自己的方式而成为他自己的客体的观点,已经被人们完全接受了,所以,尽管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也不再进一步论述它了。

从人具有自我这个事实中还可以推导出一个更加重要的论点,

即：他因此能够与他自己进行互动。这种互动不像需要之间、情绪(emotion)之间、观念之间或者弗洛伊德研究方案的伊德(id)和自我(ego)之间的互动那样，以心理系统之两个或者多个组成部分之间互动的形式存在。与这种存在方式不同，由于某个人与作为个人的他自己谈话并且进而作出反应，所以，这种互动是社会互动，是一种沟通形式。当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注意到他对自己发火、他必须在其工作中激励自己、他提醒自己应当做这做那、或者他在实现某种行动计划的过程中与自己对话时，我们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内心之中进行的这种互动。正像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自我互动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一个对自己作出指示的过程而存在的。当一个人神志清醒的时候，当他注意和考虑一个或者另一个问题、抑或观察这种或者那种事件发生的时候，这种过程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的确，对于这个人来说，意识到或者觉察到某种事物，与他向自己指示这种事物是完全相同的——他正在把它当作一种既定的客体来识别，并且考虑它对于他的行动线索来说所具有的关联或者重要意义。一个人神志清醒的生活，就是由这个人正在向自己作出的一系列这样的指示——他运用这些指示引导他的行动——组成的。

因此，我们现在有了一幅关于人作为一种通过向自己作出指示的社会过程而与自己互动的有机体的画面。这是一种与支配当代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关于人的观点根本不同的关于人的观点。处于支配地位的流行观点认为，人是一种复杂的有机体，其行为是一种对影响这种有机体之组织的各种因素的反应。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的各种思想派别在认为这些因素之中的哪一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方面有很大不同——就像它们对刺激、机体内驱力、需要倾向(need-disposition)、有意识的动机、无意识动机、情绪、态度、观念、文化习性、规范、价值、地位欲求(status demand)、社会角色、参照群体从属关系以及制度压力这些因素之极不相同的排列所表明的那样。各种思想派别还在如何看待人的结构这个方面各不相同——是把它视为一种生物结构一种心理结构，还是把它视为一种从个人的群体

所具有的社会结构引进的、经过整合的社会结构。不过,在认为人是一种进行反应的有机体、它的行为或者是那些影响它的结构的因素的产物、或者是对它的结构之诸组成部分的相互影响的表达等方面,这些思想派别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据这种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人只有在要么是社会物种(social species)的成员、要么是对其他人(社会刺激)作出反应的成员、要么是已经使其内心世界整合了其群体的结构的成员这样的意义上,他才是“社会的”。

符号互动论所坚持的关于人的观点则根本不同。它认为,人在一种更加意味深长的意义上——在它是通过向它自己作出指示和对这些指示作出反应而参与与它自己的社会互动这样一种有机体的意义上——是“社会的”。由于参与自我互动,人就处在一种与上面描述的这种广泛流传的传统观点所预设的他与其环境的关系显然不同的与其环境的关系之中。与认为人仅仅是一种对影响它或者始终操纵它的因素作出反应的有机体不同,符号互动论认为人是一种不得不对付它所注意到的东西的有机体。人通过参与一种自我指示过程应付他这样注意到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他把他所注意到的东西变成客体,赋予它一种意义,并且把这种意义当作指导他的行动的根据。就他注意到的东西而言,他的行为并不是一种由对这种东西的呈现激发出来的反应,而是一种来源于他通过这种自我指示过程所作出的解释的行动。在这种意义上,参与自我互动的人并不是一种仅仅作出反应的有机体,而是一种进行活动的有机体——是一种不得不根据它所考虑的东西形成一种行动线索的有机体,而不是仅仅针对某种因素对它的结构的影响作出反应的有机体。

### 人类行动的本质内容

人向自己作出指示的能力使人类行动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特征。它意味着,人类个体面对的是一个他为了进行活动而必须加以解释的世界,而不是一种由于他的组织结构他会对其作出反应的环境。他必须对付他需要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些情境——确定其他人行动的意义,并且根据这种解释设计他自己的行动路线。他必须构想和指导

他的活动,而不是通过对那些影响他或者始终操纵他的因素作出反应而使这种行动散发出来。也许他在构想其行动的过程中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他必须构想它。

这种关于人通过向自己作出指示而引导其行动的观点,与在当代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关于人类行动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像我们已经暗示过的那样,这种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人类行动是由具引发作用的因素、或者这些因素的组合引起的。它把行动追溯到诸如动机、态度、需要倾向、无意识情结、动机完形(stimuli configurations)、地位欲求、角色需要以及情境要求这样一些因素。它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把行动与具有引发作用的一种或者更多的动因联系起来。然而,这样一种研究忽视了个体对待其世界、构想其行动所凭借的自我互动过程,没有为后者留下任何存在的余地。个体注意和估计他所面对的东西以及他在其公开行为开始实施之前对这种公开行为之路线的设计所凭借的这种至关重要的解释过程,便被置之度外了。

从根本上说,人的行动是由他考虑他所遇到的各种事物的过程以及根据他对它们的解释设计出一种行为线索的过程组成的。他所考虑的是诸如他的愿望和欲求、他的目标、可以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他的行动和他所预期的其他人的行动、他对自己的想象以及一种既定的行动线索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他的行为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指示和解释过程而得以形成并得到引导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开始、也可能停止实行既定的行动方针,可能把它们局限于仅仅是制订计划、或者是一场内心世界的白日梦(reverie),或者即使他开始实行这些行动方针,他也有可能改变它们。我的目的不是分析这个过程,而是使人们注意到它在人类行动形成过程中的存在和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的活动是由不断应付他们必须在其中活动的情境的流动(a flow of situations)组成的,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他们注意到的东西、他们如何估计和解释他们所注意到的东西以及他们设计出何种具体化的行动线索基础之上的。通过把行动归因于某种据说引



发这种行动、并且促使它得出其结果的因素(例如,动机、需要倾向、角色需要、社会期待、或者社会规则),是无法理解这种过程的;这样一种因素或者对它的某种表达,是人类行动者在设计其行动线索的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这种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既不包含也没有解释有关处于这种需要行动的情境之中的人是怎样把它以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的。为了理解行动者的行动,人们必须深入到行动者进行的这种界定过程之中。

这种关于人类行动的观点完全可以适用于把个体成员包含在其中的联合行动或者集体行动。正像人们研究群体、制度、组织以及社会阶级的行为作为范例所表明的那样,联合行动或者集体行动是社会学关注的领域。无论这些社会行为事例是什么,它们都是由使其行动线索相互适应的个体组成的。根据这种行为的联合特征或者集体特征、而不是根据它的个别成份观察和研究这种行为,既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这种联合行为并未丧失其下列特征,即它是通过人们在对付情境——他们在这种情境中需要进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进行的解释过程而被构想出来的。无论这种集体是参加一次战役的军队,是一个试图扩展业务的公司,还是一个努力克服不利的贸易平衡的国家,它都需要通过解释正在它的活动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来构想它的行动。这种解释过程是由彼此向对方作出指示,而不是每个人都只向他自己作出指示的参与者进行的。联合行动或者集体行动是这种解释性互动过程的一个结果。

### 行动的相互联系

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人类群体生活由其成员使他们的行动线索相互适应的过程组成,并且存在于这种过程之中。对行动线索的这种明确表述导致并且构成“联合行动”——一种由不同参与者的不同活动组成的社会行为组织。虽然联合行动是由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不同的活动构成的,但是,它却既不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部分,也不等同于这些部分的累积之和。这种联合行动具有它自己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存在于这样一种整体的联合和联系之中——不同

于那些可联合或联系起来的部分。因此,人们可以在并不需要把这种联合行动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不同活动部分的情况下,识别、谈论并对待和处理这种联合行动本身。当我们谈论诸如婚姻、贸易业务、战争、议会讨论或者教会礼拜仪式时,我们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同样,正像我们在谈论一个家庭、一个商业公司、一个教会、一所大学或者一个国家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也可以在不需要识别一个集体的个别成员的情况下,谈论这个参与联合行动的集体。显然,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领域正是由这种对联合行动以及参与联合行动的集体的研究构成的。

由于未能认识到集体的联合行动是参与者之不同活动的相互联系,人们在研究论述集体和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引诱到一个错误的路子上去。这种错误使人们看不到以下事实,即一个联合行动总是不得不经历一个形成(formation)过程;即使它可能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完全确定的、重复的形式,它的每一种个别情况也都必须重新形构而成。而且,它的产生所经历的这种形成过程,必然是通过上面讨论过的、由指称(designation)和解释组成的双向过程而出现的。参与者还必须通过形成和使用各种意义引导他们各自的活动。

我希望以这些论述为背景,对这种构成联合行动的相互联系的含义作出三点评论。我首先希望考察联合行动的那些重复和稳定的个别情况。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在一个秩序既定的人类社会中,社会行动的主导部分是以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模式的形式存在的。在人们互相针对对方进行活动的绝大多数情境中,他们都预先具有对应当如何活动以及其他人将如何活动的确实可靠的理解。他们都共享在参与者的行动中被预期的东西所具有的、共同的和预先确立的意义。因此,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根据这些意义引导他自己的行为。有关联合行动之预先确立的、重复性形式的例子极其常见和普通,所以,人们很容易理解学者们为什么把它们视为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质和自然形式。就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明显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和“社会秩序”这样一些概念而言,这样一种观点的存在尤其明显。绝

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方案都建立在下列信念之上,即人类社会以一种已经确立的生活秩序的形式存在,而且这种秩序可以分解为人们对一大批规则、规范、价值——它们向人们具体说明他们在其不同的情境中应当如何行动——的遵循。

对这种精致的研究方案作出几点评论是适宜的。首先,所谓在人类社会——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生活的全部领域都只不过是对已经预先确立的联合行动形式的表达是非常错误的。在群体生活的范围内,有问题的新情境不断出现,而现存的规则对于它们来说是不合适的。我从未听说过哪一个社会没有任何问题,也从未听说过哪一个社会的成员不需要为了设计行动线索而参与讨论。在人类群体生活中,这些未经过限定的(unprescribed)行为领域就像那些由预先确立并且完全得到忠实遵守的联合行动规定支配的行为领域一样,也都是自然的、内在固有的、不断重复出现的。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就预先确立的重复性联合行动而言,这种联合行动的每一种情况也都必须被重新形构而成。参与者们依然必须通过指示和解释这样一种双向过程设计出他们的行动线索,并且使它们互相适应。当然,就重复性联合行动而言,他们是通过运用反复出现和固定不变的同一些意义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重要的是各种意义的作用和结局,而不是以其已经确立的形式存在的联合行动。重复性的、稳定的联合行动和被第一次展示出来的新的联合行动形式一样,都是一种解释过程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或者迂腐的观点;这些作为已经确立和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之基础的意义本身,既受到人们的约束或巩固(reinforcement)的影响,也受到他们原本的不满或漠不关心的影响;它们既可能受到挑战、也可能得到认可,既可能被人们漠不关心地忽略过去、也可能被注入新的活力。在这种被人们客观地感知的联合行动背后,这些维持这种联合行动的意义具有一种社会科学家们几乎无法忽视的生命力。对规范、价值、社会规则等概念的无条件接受不应当使社会科学家无视下列事实,即任何一种概念都是被一个社会互动过程包含着

的——这个过程不仅对于它们的变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以一种确定不变的形式保持它们来说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种处于群体生活之中的社会过程创造并且支持着这些规则,而不是这些规则创造并且支持着群体生活。

对于这种构成共同行动的相互联系的第二种评论,指的是各种行动那构成大部分人类群体生活的、经过扩展的联系。我们都很熟悉下面这些包含不同人的不同行动之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复杂的、大的行动网络——诸如从农民种植谷物最终到商店出售面包的劳动分工,或者从逮捕一名嫌疑犯最终到把他从监狱中释放的复杂系统(elaborate chain)。这些网络和处于不同的地点的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行动对它们的有规律的参与一起,呈现出一幅有关一直被社会学家们专门关注的制度的画面。它们还使下列观念获得了实质内容,即人类群体生活具有一种系统的特征。通过观察这样一种由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在一种有规律的运作过程中全都结合在一起——组成的大的复合体,通过观察这种由处于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的参与者组成的互补性(complementary)组织,人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者把这些网络或者制度视为自我运作的(self-operating)实体——这些实体根据它们自己的动力学而发展,而不需要去注意处于这种网络之中的参与者们。社会学对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绝大多数分析都坚持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人们应当承认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网络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一大批不同的参与者,是根据他们对各种既定意义的运用而在其位置上参与他们的行动的。一个网络或者一种制度并不是由于某些内在的动力抑或系统的要求而自动发挥作用的;它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们做了某些事情,而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则是他们界定他们需要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情境所使用的方式的结果。目前,某些论述决策的著作虽然反映了对这种观点的有限的重视,但是从整体上说,人们还是严重忽视这种观点。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使在网络中处于其特定位置的参与者——像他们所做的那样——

进行活动的意义,在地方化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具有它们自己的背景,而且这些意义都是由人们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社会性的界定过程而形成、维护、削弱、加强或者转化的。各种制度的实施过程和结局,都是在这种解释过程在不同的参与者中间发生的时候,由这种解释过程确定的。

我们还需要作出第三个重要的评论,也就是说,联合行动的任何一种情况——无论是新近形成的还是早已经确立的——都必然是从参与者以前的行动所构成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离开了这样一种背景,新的联合行动根本不会发生。被包含在这种新的联合行动形成过程之中的参与者们,总是把他们已经具有的客体的世界、各种意义以及各种解释图式带到这种形成过程之中。因此,新的联合行动形式总是从以往联合行动的脉络中显现出来、并且与这种脉络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种脉络,人们就无法理解它;人们必须把这种与以往联合行动形式的联系考虑在内。如果有人认为他可以割断任何一种既定的联合行动形式的历史联系,似乎它的构造和特征是通过自发的生成过程从真空中产生的、而不是来源于已经成为过去的联合行动,那么,他的根据就是不可靠的,从经验角度看就是无效的。面对根本不同、充满压力的各种情境,人们也许不得不发展新的、与他们以前一直参与的那些联合行动显然不同的联合行动形式,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总是存在与已经成为过去的联合行动的某种联系和连续性。如果一个人不把有关这种连续性的知识结合到他对这种新的联合行动形式的分析之中,那么,他就无法理解这种新的联合行动形式。可以说,联合行动不仅表现了参与者的活动的横向的(horizontal)联系,而且也表现了与以往联合行动的纵向的(vertical)联系。

### 总结性评论

通过我们对符号互动论之诸根本意象的简明扼要的概括论述,它的一般视角就清晰可见了。这种研究视角认为,人类社会是人们对生活过程的参与。这种生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他们所遇到的许多情境之中的参与者不断发展各种行动线

索。他们被卷入到一个涉及面很广的互动过程之中,并且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使他们那不断发展的活动相互适应。这个互动过程存在于他们不断向其他人作出应当做什么的指示,以及在其他人作出指示时不断解释这些指示的过程之中。他们生活在由各种客体组成的世界之中,并且就他们的取向和行动而言受这些客体的意义的引导。他们的客体——包括由他们自己构成的客体——都在他们彼此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形成、维持、削弱以及转化。当然,应当按照这种一般过程由于以下事实而必然具有的有差别的特征来看待这种过程,即人们群集于不同群体之中、属于不同的联合体、并且占据不同的位置。所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对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并且用那些不同的意义引导自己。不过,无论人们研究论述的是一个家庭、一个男孩子团伙、一个实业公司、还是一个政党,他们都必须把这种集体的活动视为通过指示和解释过程形构而成的东西。

### 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原理

我不是把符号互动论当作一种哲学学说<sup>①</sup>来研究论述,而是当作经验性社会科学的一种视角、当作为了提供关于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的可以证实的知识而设计的一种研究方法来研究论述的。所以,它的方法论原理必须满足经验科学的各种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是什么?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流行的有关方法论的思想和讨论,都是以在这些问题上的大量误解和混乱为标志的。我认为在这里概括论述几种基本原理是可取的。

我将从下面这样一个显得冗长的论断开始,即一种经验科学以

---

<sup>①</sup> 符号互动论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哲学提供了各种前提。通过把“自我”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通过承认它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一个人承担其他人——他和这些人都被包含在群体生活的联合活动之中——的角色而出现的,符号互动论为一种发人深思的、特别适合于研究论述社会经验的哲学提供了本质内容。乔治·H. 米德和约翰·杜威所撰写的著作,都专门论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主要原则。

一种经验世界的存在为前提,这样一种经验世界以某种可以进行观察、研究以及分析的东西的形式存在,它面对科学的观察者而存在,具有必须通过观察、研究以及分析才能得到查明和确立的特征。这种经验世界必定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就经验科学而言,它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它是检验人们对经验世界作出的任何一种论断的依据。对于经验科学来说,“实在”(reality)只存在于这种经验世界之中,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它并且证实它。

为了使这种单调乏味但又不可或缺陈述不被人们误解,请允许我插入对唯心论和实在论的传统立场所作的少数几个评论,因为这些哲学立场对人们在当代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进行的科学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传统的唯心论立场认为,“由实在构成的世界”只存在于人类经验之中,而且它只通过人们“观看”这种世界所使用的形式显现出来。我认为这种立场是毋庸置疑的。人们根本不可能举出一个可以不以人类意象(human imagery)的形式而描述这种“由实在构成的世界”之特征的例子。除了以指涉或者指示某种事物的形式认识事物以外,人们根本无法认识事物。为了指示某种事物,人们必须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种事物;他们必须按照它向他们显现的样子描述它。在这种意义上说,认为这种经验世界必然总是以人类有关它的观念和图画的形式存在的观点,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种主张并不像许多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那样,把“实在”从这种经验世界转移到意象和观念的王国里去了。如果有人认为由于这种经验世界对于人们来说只有根据人们关于它的意象或者观念才能存在,所以必须到独立于经验世界的各种意象或者观念中去寻找实在,那么他就错了。这样一种唯我论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也将使经验科学不可能存在。这种立场由于以下事实而是站不住脚的,即这种经验世界能对我们有关它的描述或者论断“反唇相讥”——在对它有关它的意象或者观念提出挑战和抵制、或者不屈从于这些意象抑或观念的意义上反唇相讥。这种抵制使经验世界得到了一种作为实在之标

志的执拗(*obdurate*)特征。人们只有通过形成一种新的意象或者观念才能适应或者化解这种抵制,这个事实并未使这种经验世界祛除其执拗特征。正是经验世界所具有的这种执拗特征——它那进行抵制和反唇相讥的能力——既召唤经验科学,又为经验科学辩护。从根本上说,经验科学是这样一项事业,它试图发展能够成功地处理和适应由这种正在被人们研究的经验世界提出的抵制的各种意象的观念。

所谓经验世界具有一种人们必须与之达成妥协的执拗特征这样一种认识,为实在论者坚持认为经验世界具有一种“真实的”特征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然而,必须避免一直困扰传统实在论、并且一直严重削弱其创造力的两种观念。其中的一种观念是,经验世界所具有的这种执拗特征或者实在,是以某种终极的形式固定下来或者永久不变的东西,而揭示这种东西就是经验科学的目标。与此相反,经验科学的历史表明,经验世界的实在是通过“此在和现在”(here and now)显现出来、并且由于各种新发现的成就而不断得到重塑(*re-cast*)的东西。认为经验世界的实在以一种永远固定不变的形式存在这样一种信念所具有的危险性,出现在认为关于这种实在的现存知识即构成这种永远固定不变的形式这样一种自然倾向之中。正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种倾向可以成为新的研究和新的发现所难以应付的障碍。削弱实在论创造力的第二种观念认为,必须根据先进的物理学的各种发现来看待和系统说明经验世界的实在——就其对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影响而言,这种观念一直特别有害。这种观念没有任何根据。经验世界所具有的这种执拗特征,就是人们通过谨慎细致和诚实的研究所发现的东西。迫使经验世界的全部领域都去适应人们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既定部分设计的方案,这是哲学上的教条至上论者的做法(*philosophical doctrinizing*),它并不代表真正的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有关经验科学的适当画面,是关于一个集体为有关这个正在被研究的、既定的经验世界之抵制特征的问题寻找答案的画



面。人们必须尊重这个经验世界所具有的执拗特征——这确实是经验科学的一条重要原理。经验科学通过不断设计有关这个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的意象、通过精确地仔细检查这个经验世界而检验这些意象,来进行其调查研究。这个简单的评论使我们得以适当地集中注意方法论这个论题。方法论指涉——或者说涵盖——各种原理,后者构成人们研究这个既定的经验世界的执拗特征的全部过程的基础,并且始终引导这种研究过程。这种方法论观念隐含着三种非常重要的观点:(1)方法论包含全部科学探索,而不是只包含这种探索之经过挑选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一方面;(2)这种科学探索的每一个部分,以及全部科学活动本身,都必须适应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的执拗特征;因此,各种研究方法都既受这种世界支配,也将接受它所作出的检验的支配;(3)这种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而不是某种科学研究模型,提供有关这种检验的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答案。我现在将详细阐述上述这三种观点。

(1) 在我看来,所谓方法论适用于、并且涵盖科学活动的所有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认识,应当是不证自明的。我们之所以需要重申这种观点,只是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倾向——把方法论与这种科学研究活动的某个有限的部分等同起来,并且进一步把一种毫无根据的狭隘倾向赋予这个部分。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方法论”令人沮丧地被人们越来越多地视为研究先进的定量研究程序的同义语,而一个“方法论者”则是精通关于这些程序的知识和运用的行家里手。人们一般认为他是根据可以用数量表示的变量系统说明他的研究——他试图通过使用复杂深奥的统计学和数学技术在这些变量之间建立关系,用优雅的、遵守“研究方案”之特殊准则(*canons*)的逻辑模型指导这种研究。这些观念都是对作为有关潜在于科学研究行为之中的各种原则之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的歪曲。经验科学的方法显然包括科学活动的全部领域——既包括作为出发点的各种前提,也包括这种活动所具有的全部程序步骤。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它们在人们发展各

种方法论原则的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分析和重视。为了理解这个问题,请允许我鉴别一下那些更重要的、构成科学研究的部分,它们也是经验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a) 具有并且使用预先存在的,有关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的**图画或者研究方案**。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就对经验世界的任何一种研究而言,这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先决条件。人们只有通过有关经验世界的某种研究方案或者意象,才能看待这个经验世界。科学研究的全部活动都是由研究者所使用的、有关这个经验世界的潜在的画面塑造并且确定方向的。这种画面确定了研究者对问题的选择和系统表述、决定哪些东西是材料、应当使用什么手段去获取材料、应当在材料中间寻找哪些关系以及使用什么形式系统说明各种命题。鉴于这种有关经验世界的最初画面对全部科学研究活动所发挥的根本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忽略这种画面简直是荒谬可笑的。这种潜在的**有关经验世界的画面**,总是能够以一系列前提的形式被人们加以识别。这些前提是由构成这幅画面的最主要客体或明确、或隐约地表现出来的本质内容构造的。真正的方法论研究所无法避免的任务,就是识别和评估这些前提。

(b) 提出有关这个经验世界的**疑问,并且把这些疑问转化成问题**。这一点构成了研究活动的开端。显然,人们提出的这些疑问和问题都确定和指引他们此后的研究路线。所以,对于方法论者来说,谨慎细致地考察和批判地估计选择和系统表述问题所使用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在选择和确定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肤浅、无聊地因循守旧以及盲目尊奉教条,构成了经验科学中人尽皆知的祸根。

(c) 确定应当寻找的材料和收集材料所使用的手段。显然,材料是由问题确定的——这表明对问题的恰当特征有把握的重要性。即使材料是由问题确定的,人们也需要持续不断地考察材料,以弄清它们是要修改这种问题,还是要求拒斥这种问题。此外,认识到用于获取材料的手段取决于被寻找材料的本质内容也很重要。反过来,如果使用于获取材料的方法决定这些材料的本质内容,则会使真正

的经验研究失去意义。这些为数不多的评论表明,人们显然需要谨慎细致地、批判性地考虑应当怎样确定和收集材料。

(d) **确定材料之间的关系。**由于在材料之间建立各种联系可以导致研究发现的诞生,所以,意识到怎样才能达到这些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人们是否通过审慎地反思他们或许设想其为有意义的关系的东西而达到这些联系,或者是否通过依靠诸如因子分析(factorial analysis)或者计算机相关图式(a scheme of computer correlation)而达到这些联系,这一点都是正确的。

(e) **解释发现。**这个终结性步骤使科学家超出了他所研究的问题的限制,因为在作出各种解释的过程中,他必须把他的发现与一种外在的理论、或者一系列超越他所作的研究的观念联系起来。就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而言,这个重要的终结性步骤尤其值得从方法论角度仔细推敲。研究者之所以能够把一种未经证实的“科学”地位赋予这种解释,只不过是因为他已经全部完成了前面的研究步骤。被研究者用来作为这种解释之背景的这种外在的理论或者一系列观念,可能是未曾经过验证的,也可能是错误的。

(f) **运用概念。**概念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们在研究者最初具有的关于经验世界的研究方案中是有意义的成份;它们可能是研究者系统说明其问题所使用的术语;它们通常是研究者寻找和收集材料所根据的范畴;它们通常成为研究者在材料之间建立联系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它们通常是研究者据以解释其发现的立足点。由于概念在科学研究中如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概念尤其需要在方法论上得到仔细推敲。

任何名副其实的方法论研究都必须涵盖上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显然是科学中经验研究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方法论研究不应当在提出一种既定的关于经验世界的图式、概括论述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确定各种材料和获得这些材料的方式、预言应当寻找的联系线索、勾勒作出解释所应当运用的框架的轮廓以及识别应当运用的概念这样的意义上涵盖这些问题,而必须在以重视和认真对待

这个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之执拗特征这样一种方式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应当遵循的各种原则的意义上,涵盖这些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的大部分方法论是不适当的、使人误入歧途的。今天被人们视为方法论的、处于压倒优势的庞然大物,就是由下列成见构成的:设计和使用复杂高深的各种研究技术,后者通常具有先进的统计学特征;构建各种逻辑和数学模型,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关于优雅的标准支配;详细阐述有关如何构想概念和理论的各种形式性的研究方案;勇敢地应用引进的各种研究方案,诸如输入-输出分析、系统分析以及随机分析;刻意遵循研究方案的各种准则;以及把一种特定的程序——诸如普查性研究(survey research)——当作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提倡。我对人们把这些成见当作方法论的要素提出来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感到惊讶。这其中的许多成见——诸如那些强调有必要使用统计和定量技术的成见——仅仅由于它们只处理全部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有限方面而忽视诸如前提、问题、概念这些问题,便完全是不适当的。最严重的是,它们几乎全都未能正视下面这种任务,即概括论述有关如何根据正在被研究的这个经验世界的本质内容构想研究方案、问题、材料、联系、概念以及解释的原则。我们引以为证的这些成见代表了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努力,这种方法论不依赖于它将在其中得到应用的经验世界所具有的执拗特征。就经验科学而言,这并不是发展方法论的方式。组成经验科学方法论的各种原则必须涵盖这种科学研究活动——不是以它自己特有的某种超然物外的逻辑形式涵盖这种活动,而是以这种科学研究在处理一个既定的经验世界的过程中所必须采用的形式涵盖这种活动。正是在这种重要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方法论不能忽视诸如应当如何观察这个经验世界、应当如何提出问题、应当如何选择材料并且确立它们的关系、应当如何解释这些关系以及应当如何运用概念这样一些问题。

(2) 通过承认方法论包括科学研究活动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我现在希望陈述和强调一个对于方法论来说更加重要的关节点。科

学研究活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因而这全部活动本身——都要接受经验世界的检验,必须通过这样一种检验才是有效的。实在存在于这种经验世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研究者用来研究这个世界的方法之中;人们将会在考察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它,而不会在分析或者详细阐述用来研究这个世界的方法的过程中发现它。各种方法都只不过是被人们设计出来识别和分析这个经验世界之执拗特征的工具,所以,它们的价值只在于它们能够使人们完成这一任务的适当性(suitability)之中。在这种基本意义上,人们在每一部分科学研究活动中所运用的程序,都应当、而且必须根据它们是否重视这个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的本质内容——根据它们表示或者暗示为这个经验世界之本质内容的东西实际上是否符合事实而得到评估。因此,人们有必要批判地考察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使用的这种关于经验世界的潜在图式,以弄清它是否真实;他们有必要批判地考察他们为了进行研究而确定的问题,以弄清它们是否真正是这个经验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有必要检查他们所选择的材料,以弄清它们在经验世界中实际上是否具有人们在研究中赋予它们的特征;同样,他们还必须离开这种研究考察这个经验世界,以弄清存在于材料之间的这些正在被考察的关系是不是以其被断言的形式被发现的;他们有必要从经验上对有关发现的各种解释加以检验,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来自这种研究以外的源泉;他们尤其有必要推敲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使用的概念,以弄清它们在经验世界中是否符合它们所要指涉的东西。这些就是进行方法论研究所需要做的事情。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今天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这种对科学研究的推敲和评估在被人们当作方法论提出的理论中是罕见的。人们几乎总是把各种前提、问题、材料、关系、解释以及概念当作既定的东西来接受,从而省略了根据经验世界进行的直接考察。与进行这种考察不同,当代流行的方法论强调的是努力确立各种研究方案、问题、材料、关系、概念以及解释之经验有效性的其他方式。这些得到人们提倡和广泛运用的其他方式如下:(a)遵守科学的实验规

程(protocol);(b)从事对各种调查研究的重复;(c)依赖对假设的检验;(d)运用各种所谓操作程序。现在我将讨论这些可供选择的每一种研究方案。

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存在着一种广泛流传、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只要忠实地遵循被人们当作研究程序的适当实验规程而共同接受的东西,就可以自动得出对于经验世界来说有效的结果。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这种“适当的”研究程序的实验规程完全标准化了;它被我们今天当作研究方案之诸原则来谈论的东西充分表现了出来。这样一种实验规程被当作研究模型呈现给学生们;学者和编辑们在评估各种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使用它;而且,各种基金会还在评估各种研究申请的过程中相当严格地使用它。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种信念,即忠实地遵循研究程序的实验规程,就可以保证人们重视这个经验世界的本质内容。当然,这样的保证根本不存在。在这种“科学实验规程”内部,人们会不知不觉地以虚假的前提、错误的问题、已被歪曲的材料、伪造的关系、不准确的概念以及未经证实的解释,来进行其研究工作。在这种实验规程中,根本没有内在固有的检验这些前提、问题、材料、关系、概念以及解释,是否得到了经验世界之本质内容的证实的机制。

这种评论也适用于对重复运用已经确立的研究实验规程的各种研究的信赖。这种重复并没有满足从经验角度证实各种前提、问题、概念以及科学研究之其他立足点的要求。一项遵循一种既定的实验规程而进行的重复性研究是否产生与以往的研究相同的结果,与有关被使用的各种前提、问题、材料、关系、概念以及解释是否具有从经验上看有效的地位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在当代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人们用来确立一种研究方法之经验有效性的主要手段,是对各种假设进行检验,这是毋庸置疑的。这里的推理很简单。人们从构建一种有关正在被研究的经验世界或者领域的研究方案、理论或者模型开始。这种研究方案、理论或者模型,表现人们认为这个世界的被构成和运动所应当采用的方式。然

后,人们就可以从这种研究方案中推论出一种论断——在如此这般的一系列经验性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期望发生什么事情。这种论断就是假设。然后,人们就安排一个对一种既定的、代表这些情况的经验领域的研究。如果来自这样一种研究的发现证实了假设,那么,人们就假定该假设从其中推论出来的这种研究方案、模型或者理论从经验角度看是有效的。从逻辑上看,这种观点建立在一种“似乎”(as if)概念之上;也就是说,人们研究这个经验世界,似乎它具有如此这般的构造;如果这个经验世界具有这种被认为属于它的构造,就推论出关于人们将会发现什么的有限而具体的结果,然后再看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实际上是否可以找到这些结果。

在这种观点中存在一种真理尺度(a measure of truth)——但是,只有当(a)这种假设集中体现它被从其中推论出来的那种模型或者理论时,以及(b)对假设的检验过程得到一丝不苟地寻找反面的经验性案例的人遵守时,情况才是如此。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所有这些条件都经常得不到满足。其假设很少反映或者体现这种理论或者模型的关键性意义,从而使这种理论或者模型由于受到检验的假设的命运而变得毫无根据或者垮台。此外,如果对假设的检验只局限于这种假设所设定的特殊经验情境,那么,这种检验显然是不适当的;必须弄清楚它在其他一系列相关的、就其背景而言尽可能有所不同的经验情境中是否有效。除非这两个经过具体说明的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人们所检验的就只是这种假设,而不是这种假设被从其中推论出来的模型或者理论图式。正像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并且出于非常充分的理由所理解的那样,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的各种理论图式,一直由于下列情况而声名狼藉:从它们当中推论出来的假设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证实,或者像偶尔发生的情况那样,即使人们发现从它们当中推论出来的假设无法得到证实,这些理论也仍然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维护一种强有力的地位不受触动的能力。我们可以在诸如本能学说、华生式的行为主义、完形心理学、刺激-反应观念、心理分析、输入-输出模型、关于人类社会的有机论观点、文化决定论以及

结构功能主义这样一些理论图式中,看到这种令人生厌的情况。这些理论图式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们在证明他们从其理论图式中推论出来的假设时从未遇到过困难。我也没有发现那些现在已经过时(*passé*)的理论由于从它们当中推论出来的假设经不起各种发现的严格检验而消失。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使它们消失的原因。这些评论将会使人们特别提防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广泛存在的、把检验假设当作确定理论图式和理论模型之经验有效性的手段来依赖的做法。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仅仅根据记录来看,就存在可以用来怀疑这种程序在确立各种前提、问题、材料、关系、概念以及解释之经验有效性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效力的重要依据。

最后一种程序类型——所谓操作程序,更不适用于确立科学研究活动之诸关键性立足点的经验有效性。“操作程序”建立在下列观念之上,即通过发展一种用来研究经验世界的特殊的、符合规律的程序,就可以既把经验性参照赋予一种理论论断或者概念,又证实这种论断或者概念。这种既定的程序或者操作既可以是对一项测验、一种量表(*scale*)、一种测量工具的运用,也可以是一个标准化的研究模型。这种程序可以使理论命题或者概念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这种既定的操作通过了各种可靠性测验,那么,人们就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可靠的、用来分离特殊经验材料的工具。同样,人们也可以把这些材料视为已经可以操作的概念或者命题之有效的经验参照物。对智力测验的运用是操作程序的一个经典性例证——这些测验都是可靠的、标准化的工具;它们产生出清晰的、可以重复的经验材料;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这些材料(智商)构成了智力概念之可靠和有效的经验性参照。实际上,几乎不用进行谨慎细致的反思就可以表明,操作程序根本不是一种对被变得可以操作的东西的经验证实。这种被变得可以操作的概念或者命题,诸如智力这个概念,指涉的是被视为在经验世界中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背景下存在的某种东西。因此,作为一个例证,智力被认为在经验生活中是存在于诸如一位军事家所拟订的具有高度技巧的军事计划、一位商业企业家对市场情境



之富有独创性的开发、一位身处贫民窟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居民所设计的有效的生存方法、一位农夫或者原始部落居民对其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巧妙解决、置身于拘留所之中的品质低劣的罪犯所要的花招这些各不相同的事物之中。认为通过一种既定的、可以使智力得到操作的智力测验,就可以得出有关智力的令人满意的画面,这种看法的毫无根据和荒谬可笑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为了形成一幅关于智力的、从经验角度看令人满意的画面——人们也可以认为这幅画面在经验上得到了证实,人们必须在智力在实际经验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把握和研究它,而不能依靠对据说是它的一个表现领域进行专门的、总是具有任意性的选择。这种评论也同样完全适用于所谓操作程序的其它所有事例。如果人们认为这种被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或者命题指涉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的某种东西,那么,作为真正诉诸经验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就无法逃脱涵盖和研究这种经验性存在之诸具有代表性的形式的必然性。当然,选择(通常是任意地选择)某种经验参照形式,并且假定对这一种形式的已经可以操作的研究可以把握这种概念或者命题的全部经验领域,是以假定作为论据来进行辩论。正是这种缺陷——它始终贯穿着操作程序——表明,操作主义<sup>①</sup>远未达到为经验科学提供必不可少的经验证明的要求。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可见,人们习惯于运用的这四种手段——遵循科学的实验规程、参与重复、检验假设以及运用操作程序——都没有提供经验性社会科学所要求的经验证明。它们无法保证各种前提、问题、材料、关系、概念以及解释在经验上是有效的。简而言之,获得这种保证的唯一途径是直接走向经验性的社会世界——是通过对它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弄清人们关于它的前提或者根本意象、针对它提出的各种疑问和问题、从它那里选择出来的材料、用来看待和分析

---

<sup>①</sup> 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是美国实验物理学家 P. W. 布里奇曼(Bridgeman)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并于50年代开始流行的学说,它主张应当根据实验操作来界定科学概念,清除在操作上无法确定的概念和术语。——译者注

它的各种概念以及应用于它的各种解释实际上是否得到了证明。流行的方法论对于这种直接考察经验性社会世界的做法没有给予任何鼓励或者认可。因此,人们为了弄清正在被研究的经验领域实际上是否与他们有关它的潜在意象相对应,撇开他们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付出勤奋努力,这是极为罕见的。同样,下面的事情也鲜有人做——独立地、谨慎细致地考察这种经验领域,以弄清人们正在提出的问题是否富有意义地表现了在这个经验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下面的事情几乎是鲜为人知的——独立地、谨慎细致地考察这种经验领域,以弄清人们当作材料来构想的东西在这个经验领域中是否真正是富有意义的材料。同样,下面的做法也远未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研究实践——谨慎细致地识别人们假设其概念所应当指涉的东西,然后对这种经验领域进行独立的考察,以弄清它的内容,弄清它的内容是证实、拒斥还是修正这种概念,诸如此类。我认为,我在得出下列结论的时候,并没有误解当前流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当前处于支配地位的研究程序,是把人们关于这个经验世界之本质内容的前提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而不是对这些前提进行考察;是由于人们提出的问题听起来像那么回事、或者源于某种理论图式,而认为这些问题是有效的;是由于人们选择的材料适合于他们有关这种问题的观念,而认为这些材料从经验上看有效;是由于人们的概念具有严密的涵义特征、或者由于这些概念是该学术范围内流行的概念,而满足于它们所具有的经验性关联。

(3) 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调查研究的广阔领域具有全面展示各种社会哲学、任其相互冲突的特征,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始终诉诸经验性的社会世界不同,人们所诉诸的是各种先验的(a priori)理论图式、一些未经证实的概念以及符合准则的各种研究程序的实验规程。这些做法在人们研究论述经验性的社会世界、迫使研究适合它们的特征以及使这个经验世界受它们的前提支配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发挥支配作用的原因。如果说这种指责似乎是没有根据的,那么,我只请大家注意下列令人惊讶的事实:虽然存在有关人类社会之

构成和本质内容的大量相互冲突的理论图式,但是,每一种图式的拥护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对这种图式的“证实”却显得极其容易;就其经验性参照而言,占压倒多数的关键性概念都一直未能在下列确切意义上得到明确的说明,即人们可以在经验世界中走向各种事例,并且有把握地说这是有关这种概念的一个事例而那个则不是(可以用诸如民德[mores]、异化、价值、整合、社会化、需要倾向、权力以及文化剥夺[cultural deprivation]这些有代表性的概念来验证这一点);学者们为研究社会生活领域设计和实施各种优雅的研究方案,而他们对这些领域却并不怎么熟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还有无休止的各种调查研究,它们都只不过是把一种已经设计好的工具——诸如一种量表或者一项测验——运用于不同的群体生活背景的做法构成的。虽然我不希望我所说的过于苛刻,但是,我相信人们必然会承认,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流行的研究方式是离开对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直接考察,而偏爱各种理论图式、预先设计的模型、大量的模糊概念、复杂高深的研究技术以及几乎是盲目地遵循被当作调查研究之适当规程获得通过的东西。人们把这些理论、模型、概念、技术以及这样一种科学实验规程都用于经验世界,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这种应用是为了检验这种理论、模型、概念、技术以及这种科学实验规程的经验有效性而被人们系统地进行的,那么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目前流行的倾向和研究实践是:使这种理论、模型、概念、技术以及科学实验规程压制人们的研究,从而使因此而出现的对这个经验世界的分析描述适合于它们的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当前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的大部分研究实际上都是以哲学家的方式研究社会(social philosophizing)。

我要再次重申,人们所需要做的,是获得那些包含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前提、问题、材料及其联系线索、概念以及解释的经验证实。通向这种经验证实的道路不是存在于巧妙运用研究方法的过程之中,而是存在于考察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过程之中。人们通过系统表述和详细推敲各种迷人的理论,通过设计各种精巧的模型,通过努

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先进的研究程序,通过采用最新的数学和统计学研究方案,通过创造新的概念,通过发展更加精确的定量分析技术,或者通过坚持遵循研究方案的各种准则,都不能实现这种经验证实。这些成见——我们对它们在其他方面具有的优点不抱任何偏见——都没有沿着这里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所需要做的是,回到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中去。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求直接考察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他们会说这正是他们在其研究中所做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认为,当他们做诸如收集和分析各种各样的人口普查材料、对社会进行通盘调查、通过各种问卷从人们那里得到各种陈述、进行民意测验、进行富有辨别力的诊所调查、运用各种量表和经过改进的测量工具、把社会行动置于可以控制的实验室情境之中、谨慎细致地用计算机模拟社会生活以及运用至关重要的经验材料检验各种假设这样一系列事情时,他们就是在直接考察这种经验世界。他们也许还会进一步以一种带有义愤色彩的态度指出,他们不仅直接考察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而且他们还以唯一可以允许的适当方式考察它——通过严格遵循经过长期检验的科学程序准则而考察它。因此,他们提供的精确的、经过检验的经验材料,以一种明确的方式集中涉及既定的问题,并且使人们能够把各种清晰的关系分离出来,从而取代了来源于门外汉和新闻记者的那些松散、含糊、只能给人留下一般印象的说明。所谓遵循已经确立的科学实验规程就是参与对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直接考察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科学家中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弄清楚,我倡导转向对这种经验性社会世界的直接考察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从人们将会如何识别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开始。这个世界就是人们实际的群体生活。它是由人们在以个体和集体的形式参与其各自的生活形式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和所经历的东西构成的;它涵盖了由相互交织的活动构成的各种大的复合体,而这些活动是作为某些人为了影响其他人的行动而展开的行动发展起来的;它体

现了存在于参与者之间的各种关系。举几个例子来说,这种经验世界是由一个少年的团伙生涯中所发生的事件、一个实业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中所发生的事件、在好战的种族群体内部或者在与这些群体发生对抗的警察内部所发生的事件、在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内部所发生的事件、在天主教教士中间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在处于其不同的生活历程之中的个体的经验中所发生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简而言之,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就是日常经验的世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所看到、并且通过其他人的生活所认识到的这种经验的最高层次。一个人类社会、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它内部的任何一种组织、或者它的参与者们的生活,都是由人们在对付出现在他们各自世界中的情境时所具有的行动和经验组成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各种问题,都必然以这种不断进行的群体生活作为源泉和归宿。无论这些问题指涉的是马上就会发生的事件——正如就一场学生骚乱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是导致这样一种骚乱的背景原因、是各种制度的组织、是人们那已经分层的关系、是人们用来指导其生活的方式、还是通过参与群体生活形成的由个体组成的个人组织,这一点都完全适用。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无论就这个民族而言还是就那个民族而言,无论在哪一个地域之中,不断进行的群体生活都是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经验性的社会世界。

有必要就对这种世界的研究作出几个简单而又非常重要的评论。第一个评论是,根据界定,进行研究的学者几乎并不怎么直接熟悉他所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他很少参与这个领域,而且通常与被包含在这个领域中的人们的行动和经验并没有形成密切的联系。他的立场几乎总是一个局外人的立场;因此,他所具有的、关于在这个既定的生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简单知识显然是有限的。这并不是对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的指责;它只是一种简单的、适用于下列所有人的评论——就这些人于一种生活领域的关系而言,他们并未通过个人交往详细地认识它。试图研究拉丁美洲的犯罪、学生骚乱或者非洲政治精英的社会学家,研究青少年使用毒品、黑人学校儿童中存在的

报复、或者少年犯中间存在的社会判断力的心理学家,都显示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正在被考察的生活领域的不完全熟悉。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最初所具有的立场,实际上总是一种他们为了研究而选择出来的生活领域中正在实际发生的事件缺乏熟悉的立场。

这使我得出了第二个简单的评论,也就是说,尽管进行研究的学者缺少这种直接的熟悉,他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形成有关他试图研究的生活领域的某种画面。他将会调动他已经具有的各种信念和意象,以形成关于这种生活领域的或多或少可以理解的观点。他在这个方面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无论我们是门外汉还是学者,我们都必然会通过我们已经拥有的意象来观察我们不熟悉的某种群体生活领域。我们也许并不直接熟悉少年犯群体、工会、立法委员会、银行董事会或者一种宗教崇拜活动内部的生活,但是,只要具备了少数几条线索,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形成可以利用的有关这种生活的画面。正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各种一成不变的意象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开始加入进来并且发挥支配作用。作为学者,我们都拥有为我们所共同拥有的、我们用来看待我们所不了解的经验性社会生活领域的刻板模式(stereotype)。此外,在社会科学中,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拥有另一些预先确立并为他所用的意象。这些意象是由他的理论、他自己的专业圈子里流行的信念以及他那有关必须以某种方式确立这个经验世界、以便他能够遵循其研究程序的观念构成的。任何一个细致谨慎的观察者都无法诚实地否认事实就是如此。在人们为了适合其理论而形成有关这种经验世界的各种画面的过程中,在人们根据那些在他们的同事中间获得广泛接受的概念和信念组织这些画面的过程中,在人们为了适应科学实验规程的要求而形塑这些画面的过程中,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诚实地指出,在社会科学中,一个学者要着手研究一个他当初并不了解的既定社会生活领域,他就会根据预先确立的各种意象形成有关这个领域的画面。

如果既定的调查研究是由一种真心实意地、持续不断地检验和修改人们的意象的努力支配,那么,人们对这种自然而然的倾向和实

践就不会有所争议了；但是，这并不是当代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流行的主题。人们顽固地坚持各种理论立场，将其领域中的各种概念和信念毫无根据地当作天生就是正确的东西来接受，并且认为科学研究程序的各种准则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从这些发源地产生的各种意象控制人们的研究、塑造有关正在被研究的生活领域的画面，也就不会令人惊讶了。不是这些意象由对这种生活领域的直接熟悉检验和修改，而是这些意象变成了这种熟悉的替代物。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误，请让我对它加以说明。

首先，绝大部分调查研究（当然，是人们根据当前流行的方法论形成的调查研究）都不是为了发展一种对正在被研究的生活领域的详细的、合乎情理的充分熟悉而设计的。这里不存在对进行研究的学者的下列要求，即在这个领域中进行大量的自由探索，不断接近这个领域所包含的人们，在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情境中看待它，注意他们的问题并且观察他们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参加他们的各种谈话，以及在他们的生活不断发展时观察这种生活。与这种探索和灵活地寻求与正在进行的事件密切接触不同，人们现在信赖从一种理论或者模型开始，根据这种模型提出问题，根据这种问题设立假设，概括论述一种研究方式来检验这种假设，使用各种标准化的工具来获取精确的材料，诸如此类。我在这里只希望再次断言，当前流行的有关“适当的”研究程序的方案，都未能鼓励、或者为人们发展对正在被研究的生活领域的直接熟悉准备条件。<sup>①</sup>而且，缺乏这种直接熟悉的学者还很可能认识不到他正在与某些事物失之交臂。由于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种可

---

① 请看一下人们向各种基金会机构及其专业顾问委员会提交的有关探索性研究的基金申请报告——或者像我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高级研究部门所收藏的博士论文所表明的那样——是在何种程度上获得通过的！你会亲眼目睹出现的连珠炮式的提问：你的研究方案在哪里？你的模型是什么？你的指导性假设是什么？你怎样使这种假设变得可以操作？你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是什么？你打算使用哪些标准工具去获得与你的变量有关材料？你的样本是什么？你的控制群体是什么？诸如此类。这些提问预先假定研究者拥有其探索性研究所试图获取的直接知识。由于他并不具有这种知识，所以，已经变成实验规程的研究程序就成了代替获取这种知识之过程的替代物。

能来源于直接熟悉的知识,所以,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失去这种知识。由于他以为得到认可的科学研究方案理所当然地就是正确的研究和分析手段,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关注对这种生活领域的直接熟悉。通过这种方式,已经确立的科学研究实验规程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代替对这个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直接考察的东西。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确定的各种问题、遵循的各种线索、获得的各种资料、想象的各种关系以及努力试图作出的各种解释,都来源于这种调查研究方案,而不是来源于对这个正在被研究的经验领域的熟悉。

我所指出的这种代替正在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在逻辑上必然会提出的疑问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拥有关于这个正在被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知识为什么是重要或者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中不是极其意味深长、影响广泛,那么,人们很快就会把它当作一个愚蠢的问题而抛在一边,<sup>①</sup>所以,人们应当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不过是,这种经验性的社会生活是由不断进行的群体生活组成的,人们要想了解它的内部正在进行的事件就必须接近它。如果人们打算重视这种社会世界,那么,他们的各种问题、指导性观念、材料、关系图式以及有关解释的观念,就必须与这个经验世界保持一致。就人类群体生活而言,由于人们在其集体生活中持续不断地具有确定分立的,既以不同生活情境之不断发挥作用的背景(milieu)为标志、又以人们拥有用于对付这些情境的不同信念和观念为标志的世界的倾向,所以情况尤其是如此。人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就一个军事精英、一个教会的教士、一个现代城市中的卖淫者、一个农民革命组织、职业政客、贫

---

<sup>①</sup> 今天,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主要是通过设计一种引人注目的理论、详细阐述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提出一种迷人的分析方案、构想一种从逻辑角度看简洁或者优雅的模式、研究和发展各种高级的统计学和数学技术、实施作为研究方案之精华的各种研究或者(以我在本文中不打算论述的东西为例)参与对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卓越的思辨分析,来获得荣誉。通过对一个既定社会生活领域中正在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直接观察而进行研究,就是提出一种附属性或者边缘性的立场——人们称它为“软”科学或者报刊通俗文章。



民窟居民、一个大实业公司的领导阶层、一个赌博辛迪加、一座大学的教职员以及无数诸如此类的人士而言存在的不同世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它们所必须对付的情境的状况,它们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存在于它们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们用来看待它们的世界的各种观点和意象,以及由它们的成员形成的各种个人组织——所有这些方面和其他更多的方面一道,都反映它们那不同的经验世界。人们不应当使自己无视对下列事实的承认,即在不断进行其集体生活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各种极为不同的世界。为了明智地研究这些世界,人们必须了解它们;而为了了解它们,人们就必须详细地考察它们。任何一种理论化——无论它多么富有独创性,以及任何一种对科学实验规程的遵守——无论它多么小心翼翼,都不能代替人们不断发展的熟悉这个正在被研究的生活领域中正在实际进行的事件的过程。

我们还应当补充说,不断发展的群体生活,无论就其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它的某一种领域来说,就我们有关它的感知而言,都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对它麻木不仁的人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对它有什么了解。站在很远的地方观看它,只看到它的很小一部分的人,也相应地只能拥有关于它的有限的知识。参与它的人将拥有更多关于它的知识,尽管这种人若是朴素的、观察力不敏锐的参与者,他的知识可能是相当有限的和不准确的。而观察力非常敏锐的参与者则会拥有更加充分、更加准确的知识。但是,有一些发生事件的层次是所有参与者都觉察不到的。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这种不断进行的群体生活过程——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那么,对这种群体生活的研究就要求我们扩展和深化我们对它的感知。如果我们希望形成一种精确的关于它的知识,那么,这就是这种运动——从无知或者蒙昧状态走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更丰富、更精确的意识的运动——的方向。我所喜欢用的比喻是关于揭开掩盖或者遮蔽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帷幕的比喻。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揭开掩盖人们试图研究的群体生活领域的帷幕。通过——无论在何种程度上——用预先

形成的意象代替直接的认识,是无法揭开这些帷幕的。只有通过不断接近这个领域,通过谨慎细致的研究不断深入到它的内部,人们才能揭开这些帷幕。不鼓励或者不允许这样做的各种方法论研究方案,都违背了重视人们的经验世界之本质内容这样一种主要原则。

人们怎样才能接近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并且深入到它的内部之中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接近某个既定的领域并且观察它的简单问题。它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要求人们进行高度谨慎细致和诚实的探索工作,具有富有创造性而又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在研究过程中既足智多谋又富有灵活性,仔细考虑正在被发现的东西,并且随时准备检验和重塑自己有关这个领域的各种观点和意象。在自然科学的伟大人物之中,查尔斯·达尔文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研究之所以不是“推测性”研究,仅仅是因为它既不运用定量研究程序,也没有遵循一种预先制订的科学实践规程。在分析它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在真正严格的意义上理解所谓它的要求是很高的。我把这两个部分分别称为“探索”(exploration)和“审视”(inspection)。这两种研究方式把对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直接的自然主义考察,与当前流行的方法论所采纳的研究方式清楚地区别开来了。我将简要论述一下探索和审视所包含的内容。

### 探索

对人类生活的探索性研究,是同时达到两个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之目标的手段。一方面,它是使一个进行研究的学者能够形成有关他所不熟悉、因而也不了解的社会生活领域的详细而全面的知识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也是他用来发展他的研究、并且使之不断变得更加敏锐的手段,因而也是使他那来源于并且仍然植根于这种正在被研究的经验生活的问题、研究方向、材料、各种分析关系以及解释不断变得更加敏锐的手段。根据界定,探索是一种灵活的研究步骤——在实施这些步骤的过程中,研究者从一条研究路线转到另一条研究路线,在研究过程中不断采用新的观察点,沿着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各种新的方向前进,并且在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充分的理解时改变他

对相关材料的认识。就这些方面而言,探索性研究与当前流行的科学实验规程所要求的那种已经被规定和限制的研究程序形成了鲜明对照。探索性研究程序所具有的这种灵活性,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没有任何方向;它只意味着这种研究的焦点最初是宽泛的,只是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才逐渐变得敏锐起来。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是走向对人们提出问题所应当使用的方式的更清楚的理解,是了解什么材料是适当的,是发展关于哪些关系线索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也是人们根据他们就这个生活领域而言正在学习的东西逐渐形成其概念工具。就这个方面而言,它与下列进行研究的学者那多少有些自负的态度不同——根据已经确立的科学实验规程,这种学者在进行研究之前就需要提出一个确定的、经过明确组织的问题,知道他应当收集哪些种类的材料,具有并且坚持运用一整套预先安排的技术,并且根据以前确立的范畴塑造他的各种发现。

由于探索性研究所具有的灵活性,所以,它不受任何一套特定的技术限制。它的指导原则是使用从伦理角度看可以使用的任何一种研究程序,只要它有可能向人们提供获得关于这个社会生活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件之更加清晰的画面的可能性就行。因此,它也许包含直接观察、对人们的访谈、倾听其对话、获得生活史(life-history)叙述、使用各种书信和日记、查阅各种公共档案、安排各种群体讨论以及重视某一个项目——只要这样做看起来值得。在人们运用这些研究程序之中的任何一种研究程序时,都不存在他们所应当遵循的实验规程;这种研究程序应当适合于它的各种境况,并且由人们对它的适当性(propriety)和创造力的判断来支配。然而,在进行这种探索性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应当牢记少数几个特殊的要点。人们应当孜孜不倦地寻找这个生活领域的参与者——这些人应当既有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又有见多识广的人士。一个这样的人抵得上100个根本没有观察能力的其他参与者。作为一个讨论群体和资源群体(resource group)而集中在一起的少数几个这样的个体,比任何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抽样的价值都要大许多倍。这样一种集体讨论其生活领域、并且

在他们相互应付对方的不同意的过程中对这个领域加以深入探讨的群体,将会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种方法都更能够揭开掩盖这种生活领域的帷幕。

对于进行探索性研究的学者来说,时刻留心对他那有关他正在研究的生活领域的各种意象、信念以及观念进行检验和修改的需要,是特别重要的。这种检验和修正可能部分地是由于直接观察和报告人(informants)告诉研究者的事情,但是,由于他的任务的范围包括对他的报告人都不了解的那些领域进行探索,所以,他应当努力培养一种准备就绪状态——随时准备以新的方式看待他的研究领域。达尔文——他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有案可查的最伟大的自然主义观察者之一——已经注意到各种意象很容易对观察发挥束缚和限制作用。他介绍了有助于打破这种束缚的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问自己所有各种与正在进行的研究有关的问题——即使似乎是荒谬可笑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助于使观察者对不同的、新的视角变得敏感。达尔文推荐的另一种方式是,既把对人们的各种工作观念提出挑战的所有各种观察记录下来,也把任何一种奇特可笑、令人感兴趣的观察记录下来——尽管后者的关联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达尔文已经从其个人经验出发,指出了这些观察是多么容易从记忆中消失,而且一旦它们被保存下来并且受到反思的影响,它们一般都会成为使人们富有创造性地重新引导其视角的重要支点(pivots)。

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发展和充实一幅有关研究领域的画面。这幅画面应当能够使学者觉得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和在家里一样,使他能够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思辨为依据发表言论。这幅画面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意义支撑物(bearing),所以他知道,他就这个经验领域提出的各种疑问都是有意义的、与这个领域相关的,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都不是杜撰的,他所获取的各种材料根据这个经验世界来看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他所遵循的各种研究线索也是与这个世界的本质内容相一致的。鉴于探索性研究就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而言所具有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价值和必要性,

所以,说这些科学之流行的方法论成见实际上对这种研究类型保持沉默,是对这些科学作出的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注解。

应当指出的是,通过探索性研究而被揭示出来的这种单纯的描述性信息,本身就可以为学者就其正在研究的对象而言在心目中可能具有的理论问题提供答案服务。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个面对他所不熟悉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学者,将会预先设计他认为必定可以说明这个领域之诸疑难特征的各种分析方案。探索性研究所具有的令人感兴趣的价值之一,是它所提供的比较充实的描述性说明,常常在不需要援引任何一种理论、或者不提出任何一种分析方案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说明令人感到疑难的东西。然而,通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的有关这种社会生活领域的画面,却不会使人们通过对这个经验性社会世界的谨慎细致的直接考察所获得的东西归于终结。这种直接考察确定了人们对另一种研究程序的需要;我认为把这种程序称为“审视”是很合适的。

### 审视

这种对经验性社会世界的直接考察并不局限于构想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面而详细的说明。它还应当体现分析。参与直接考察的这个进行研究的学者的目标应当是以一种理论的形式系统地说明他的问题,揭示各种一般的关系,使他的概念的内涵性参照鲜明突出,以及系统表述各种理论命题。与准备单纯的描述性说明不同,这种分析才是经验科学的适当目标。人们在対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进行直接考察的过程中,尤其是就探索所提供的对这个世界的说明而言,应当怎样进行科学分析呢?一般的回答是,把人们从当代流行的方法论中采纳的科学分析方案运用到这种说明上去。这种方案具有下列形式:从人们根据概念或者范畴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一种理论或者模型开始,运用这种理论在这个正在被研究的领域中确定一个具体的问题,把这种问题转变成代表各种概念或者范畴的、具体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使用各种精确的技术获取材料,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运用这种理论和模型说明这些关系。把这种约定俗成的方案运用到

探索所提供的说明上去,当然会胜过人们通常的所作所为,因为人们这样处理的就是来源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材料,而不是来源于人们设想将会发生的事件的材料。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人们在直接考察这个经验性的社会世界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这种分析来说,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科学分析实验规程既不是适宜的,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即使人们使用探索所提供的更注重实际的材料,这种约定俗成的科学分析实验规程也会迫使这些材料削足适履地适合一种严重限制和损害真正的经验分析的人为框架。科学的分析需要两种事物:清晰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分析成份,对这些成份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分离。这种约定俗成的实验规程既不以精确的方式确定这些分析成份在这个经验性的社会世界之中所具有的本质内容,也不以精确的方式探索出存在于这些分析成份之间的关系。因此,一种不同的分析程序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审视”就构成了这种必要的分析程序。

我用“审视”这个术语,既指对人们为了进行分析而使用的无论什么分析成份之经验内容的高度集中的考察,也指对这些成份之间的各种关系之经验性本质内容的同一种考察。请允许我对这个抽象的陈述加以说明。我所谓“分析成份”指的是在这种分析中被当作关键性项目来使用的、无论是普遍性项目还是范畴性项目,诸如整合、社会流动、同化、卡里斯马式领袖、官僚制关系、权威系统、压制异议、道义、相对剥夺、态度以及制度性承诺。正像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分析成份可以指涉各种过程、组织、各种关系、关系网络、存在状态、个人组织成份以及各种事件的发生。这些分析成份可以在各种一般性层次上得到系统说明——从诸如整合这样非常宽泛的内容,一直延伸到诸如就城市黑人青少年而言的流动愿望这样非常具体的内容。审视的程序是,通过细致谨慎地、灵活地仔细考察这种分析成份所涵盖的种种经验性案例,对这些分析成份进行明察秋毫的考察。这些经验性案例都是在这个正在被研究的领域中出现的案例;对它们进行的细致谨慎、灵活的考察,也是在它们在其中发生的那种经验领域的脉络中完成的。因此,就一种诸如同化这样的分析成份——让我

们说它指涉的是少女们被有组织地卖淫所同化——而言,各种经验性案例当然由经历过这种同化的少女之各自的经历组成。为了把这种同化的一般性本质内容分离出来而谨慎细致地考察这些经验性案例,就表现了我使用“审视”这个术语所要表现的东西。

作为一种程序,审视由对既定的分析成份的考察组成,后者则是通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接近这种既定的分析成份、从各不相同的角度观察它、提出有关它的许多不同的问题,以及从这些问题的立场出发回到对它的仔细考察而进行的。审视的原型是由我们应付一个陌生的物理客体的过程表现出来的;我们可能把它捡起来,仔细地观察它,在观察它的过程中把它翻转过来,从这种或者那种角度观察它,提出关于它可能是什么的种种问题,根据我们的问题回过头来重新处理它,对它进行彻底的实验,以及用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检验它。这种详细的、不断转变的仔细考察就是审视的本质。这种审视不是预先确定的、已经常规化的东西,也不是被规定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并且因而能够像一位技师所做的那样诉诸一项特殊的测验时,它才能变成现在的样子。与此不同,审视是灵活多变的、想象性的、创造性的,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采取各种新的方向。就一种社会客体、一个过程、一种关系或者在对经验性社会生活之某一既定领域抑或既定方面的理论分析中得到运用的任何一种成份而言,这种考察类型也都可以这样完成。人们走向有关这种分析成份的各种经验性案例,在它们不同的具体背景中看待它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观察它们,就它们的一般特征提出有关它们的各种问题,回过头来重新考察它们,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并且以这种方式筛选出这些经验性案例所表现的这种分析成份的本质内容。这种确定分析成份之本质内容的过程,是通过仔细考察这种经验生活本身、通过发现这种经验生活在经历这样一种谨慎细致的和灵活的探索时所提供的东西而完成的。我从未听说过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可以用来确定人们在分析既定的经验性社会生活领域时所试图使用的分析成份之本质内容;而且我仍然确信,这种分析成份对于这样的用法来说既是恰当的,也是有效的。

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审视是当代流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方法论中概括论述的科学研究方式的对立面(antithesis),这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审视不受某种固定不变的研究方式和程序的束缚;它并不从那些其本质内容已经预先被确定、而且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从未经过检验和修改的分析成份开始;它通过考察这个经验世界本身发展这些分析成份的本质内容。审视是与通过使一种分析成份变得可以操作而把一种“本质内容”赋予这种成份的做法(例如,根据智商来界定智力)完全对立的。与这种做法不同,审视试图通过对一种分析成份在经验世界中具有的各种案例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察,来识别这种分析成份的本质内容。由于未能使用这种审视程序,所以,当代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分析成份的使用多少有些令人反感。这一点就我们的概念的状态而言是再明显不过了,处于这种状态的概念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分析成份。我们的占压倒多数的概念就其经验性涵义而言显然都是含糊不清的、不准确的,<sup>①</sup>然而,我们在我们的分析中随随便便地到处使用它们,从不关心对它们的经验性涵义进行详尽阐述、重新界定或者检验。对它们的经验性意义的必要的改进,在任何程度上都无论如何不是通过使这些概念“变得可以操作”而实现的。只有通过谨慎细致地审视它们的经验性案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它们的特征分离出来重新加以界定,这种改进才能实现。

对于完成社会分析的另一部分——把各种分析成份之间的关系分离出来——来说,审视也是一种适当的程序。这样一种关系假定,这个经验世界之中的各种成份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由于作出了这样的假定,所以,这种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关系就需要仔细考察,

---

<sup>①</sup> 为了使这种指责不至于处于未经证实的状态,我们请读者尝试确定下列这一大批得到人们普遍运用的、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概念的经验性意义:民德,整合,社会角色,异化,社会化,态度,价值,失范,以及越轨。经验性意义并不是由仅仅为话语的目的服务的界定给定的;与此不同,它存在于具体的说明之中,后者使人们得以走向这个经验世界,并且能够使人们就任何一种经验事物而言有把握地说这是有关这个概念的一个案例,而那则不是,请读者在观察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过程中,尝试用上面这些概念去做。



就像有关各种分析成份之经验性涵义的论断也需要仔细考察那样。人们需要通过对于这种被断言的关系有关的经验性案例进行谨慎细致的、灵活的仔细考察,来确定和检验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审视,那么,人们就会被其以前具有的关于这种关系的意象或者观念所束缚,既无法通过了解这种观念是否从经验角度看是有效的而获得好处,也没有通过对各种经验性案例的明察秋毫的考察而用来重新界定和改进这种观念的手段。

分别代表描述和分析的探索和审视,构成了人们用于直接考察这个经验性社会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程序。它们构成了人们有时称之为“自然主义”方法的调查研究;它所针对的是一个通过其不断发展的自然特征而存在的、既定的经验世界,而不是针对这样一种世界的模拟、不是针对在它那里进行的一种抽象(正如就实验室试验而言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也不是针对以关于这个世界的预先确定的意象的形式而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替代物。自然主义研究的优点在于,它重视并且接近这个经验领域。由于人们是通过其群体存在形成不同的世界和各种生活领域的,所以,这种重视和接近在社会科学中特别重要。这些世界既表现又塑造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各种活动、他们的各种关系以及他们的各种制度。对于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样一种世界或者生活领域几乎总是遥远和未知的;这就是他之所以要研究它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他应当接近这个通过其实际经验特征而存在的世界。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就无法保证他那有关这个领域或者世界的指导性意象、他针对它所确立的问题、他所确定的研究线索、他收集的各种材料、他宣告的在这些材料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指导他作出解释的各种理论观点,从经验角度看是有效的。就对人类群体生活的科学研究而言,包含探索和审视这双重程序的自然主义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就“科学”这个术语之最完整的意义而言,这种研究完全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研究。

我的描述性陈述已经在以探索和审视的形式存在的自然主义研

究,与在当前流行的方法论中极富活力地被人们采纳的、形式化的研究类型之间,树立了相当鲜明的对立。由于希望使社会科学家们从不知不觉地受一种研究格式(format)——这种格式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进行科学研究所必然要采用的适当方式——束缚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强调这种对立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存在社会科学中许多值得注意的研究都是进行自然主义研究的结果这一事实,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为自然主义研究辩护的人的确很少。对自然主义研究的考虑几乎无法进入到今天的方法论内容之中。而且,就我所能够观察到的而言,人们在自然主义研究方面进行的训练是默默无闻的(soft-pedaled),或者说我们的主要研究部门根本就没有提供这种训练。对它的普遍忽视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视进行这种研究的必要性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这对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来说是不幸的,因为作为经验科学,它们的使命就是努力对付它们的经验世界。

### 方向论取向

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对科学地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进行的实事求是地探讨的理论方法。它的经验世界就是由这种群体生活和行为组成的自然的世界。它在这个自然的世界中提出它的各种问题,在这个世界中进行它的研究,并且从这些自然主义研究中推论出它的种种解释。如果它想要研究社会运动,它就会谨慎细致地追溯这些实际运动的历程、历史以及有关的生活经验。如果它想要研究青少年对毒品的运用,那么,它就会走向这些青少年的实际生活,以观察和分析对毒品的这种运用。就引起它注意的其他问题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所以,它的方法论取向就是直接考察这个经验性社会世界的方法论取向——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方法论研究。它承认,这种直接考察使学者能够满足一门经验科学的所有基本要求:直接面对一个可以观察和分析的经验世界,提出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抽象问题,通过谨慎细致、训练有素地考察这个世界收集必要的材料,揭示

这些材料类型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系统表述有关这些关系的命题,把这些命题编织成一个理论图式,通过重新考察这个经验世界检验这些问题、材料、关系、命题以及理论。符号互动论并未被下列神话般的信念引入歧途,即为了使研究成为科学的研究,人们必须把其研究塑造得适合以前确立的经验研究实验规程,诸如采用先进的自然科学之行之有效的程序,预先设计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模型或者数学模型,迫使这种研究适合实验室试验的模式,把一种统计学框架或者数学框架强加给这种研究,根据预先确定的变量开展这种研究,或者使这种研究局限于一种像普查性调查研究这样的特殊的标准化研究程序。符号互动论承认,经验科学的真正标志是重视它的经验世界的本质内容——使它的各种问题、它的指导性观念、它的研究程序、它的研究技术、它的概念以及它的理论符合这个世界。它认为,这种对种种问题、概念、研究技术以及理论图式的确定,应当通过直接考察这个实际的经验性社会世界来完成,而不应当通过以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模拟、以一种预先确定的有关这个世界的模型、以一幅从关于这个世界的少数几种零散的观察推论出来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画面、以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为满足引进的某种理论图式或者某种“科学”程序图式的需求而预先形成的画面、或者以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从对这个世界的不完全和未经检验的说明出发形成的画面进行研究来完成。对于符号互动论来说,这种经验性社会世界的本质内容,应当通过对这个世界进行直接的、谨慎细致的、探索性的考察来发现和揭示。

这种方法论取向对人们时常提出的所谓符号互动论无益于科学研究的指责作出了回答。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指责。显然,指出它的那些人是把当前流行的方法论中关于科学研究的观念当作判断符号互动论的标准来运用的。例如,他们问道,符号互动论者怎样使“自我”“变得可以操作”,怎样设计一种适当的量表以测量有关姿态的解释,怎样确立对发展新的自我观念的过程进行的可以控制的实验,怎样运用各种统计学程序分析新的社会客体的形成过程,或者怎样

使“一般化的他人”进入诸如随机分析、系统分析、抑或操作分析这样的研究程序框架之中。这些要求都是荒谬的(虽然有些符号互动论者严肃地对待它们,并且努力满足它们!)。这些要求既表现了对科学研究的极度误解,也表明了对符号互动论的极度误解。符号互动论的命题和概念都是为了直接考察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而设计的。它们的价值和有效性都应当通过这种考察来确定,而不应当通过看它们在受一种毫不相干的方法论的不同标准影响时怎样取得成功来确定。

当然,也必须使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前提——我在前面当作它的根本意象而加以讨论的那些内容——的经验有效性得到检验。如果它们无法经受住这种检验,那么,它们和它们所支持的符号互动论的图式就会被人们一道毫不留情地抛在一边(人们为了研究和分析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提出的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图式,也都应当接受这种检验)。检验这些前提的方式是走向这种经验性的社会世界,因为这些前提都是对这个世界之本质内容的陈述。请允许我让读者回忆一下符号互动论的这些基本前提:人类群体生活是由使参与者的各种行动线索相互适应的过程组成的;这些密切合作的行动主要是由互相向对方指示应当做什么、然后解释由其他人作出的这些指示的参与者进行的;人们从这种互动出发形成那些构成其世界的客体;人们都准备根据他们的客体对于他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客体进行活动;人们把他们的世界当作具有自我的有机体来对待,这样就可以使每一个人都对他自己作出各种指示;人的行动是由行动者根据他所注意、解释以及评估的东西构造的;而这种不断进行的行动的相互联结过程就形成了各种组织、制度以及庞大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复合体。为了检验这些前提的有效性,人们必须走向对实际人类群体生活的直接考察——而不是走向一种人为的实验室环境,不是走向一种可以使概念变得可以操作的方案,不是走向对各种假设的检验,而是走向仔细考察是否能够使这些前提适合一种研究程序的实验规程。符号互动论的前提都是简单的。我认为人们仅仅通过观察他

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直接面对的、正在不断发展的事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它们得到检验和证实。我很想——多少带点儿挑战意味地——邀请社会学家们对构成今天流行的、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和社会行动的其他理论图式之基础的那些前提,进行同样的检验。

假如人类群体生活具有符号互动论的这些前提所陈述的特征,那么,我希望考虑的一般论题就是人们怎样才能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社会行动。我并不想识别和分析为数众多的、人们在进行探索和审视的一个或者另一个关节点上可能会使用的、互不相关的程序。有数量相当多的文献——它们良莠不齐,未必都真实可靠——论及这些互不相关的大量程序,诸如直接观察、实地研究、参与观察、个案研究、访谈、生活史的运用、书信和日记的运用、公共文献(public documents)的运用、小组讨论以及对话的运用。我要补充的是,人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些程序进行谨慎细致的研究——不是把它们置于一种标准化的格式之中,而是改进它们作为发现实际群体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工具所具有的功能。然而,我目前的关注点却处在一个不同的方向上,也就是说,我想指出符号互动论者关于人类群体生活和社会行动的观点所具有的几个更重要的方法论含义。我想就符号互动论的四种核心观念之中的每一种核心观念来考虑这些含义。这四种核心观念是:(1)以个体和集体的形式存在的人们,都准备根据构成其世界的客体所具有的意义进行活动;(2)人们的联合体必然以一种过程的形式而存在,他们在这种过程中相互作出各种指示,并且互相解释对方的指示;(3)社会活动——无论是个体社会活动还是集体社会活动——都是通过一种过程形构而成的,行动者通过这种过程注意、解释以及评估他们所直接面对的各种情境;(4)组成组织、制度、分工以及相互依赖网络的各种活动的复杂的相互联结,都是不断运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事件。我希望依次讨论这里的每一种核心观念。

(1) 所谓人们根据他们的客体所具有的意义进行活动这种论点,具有意味深长的方法论含义。它所直接表示的是,如果一个学者

希望理解人们的行动,那么,他就必须像他们看待其客体那样看待他们的客体。未能像他们看待其客体那样看待他们的客体,或者以他自己关于这些客体的意义代替他们关于这些客体的意义,是社会科学家有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其结果是,他建立了一个虚构的世界。简而言之,人们是根据这些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物对于这个置身事外的学者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进行活动。然而,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对人类群体生活和人们的行为的种种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从不尝试弄清楚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所针对的东西的。这种忽视得到了当前流行的方法论中存在的两种致命倾向的正式促进:(1)它得到了下列信念的促进,即只要擅长于运用各种科学的技术加上对某种既定理论的熟练掌握,就足以研究一个不熟悉的领域;(2)它还得到了强调客观性这样一种倾向的促进,这种倾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意味着应当从超然的局外观察者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事物。我们看到对诸如少年犯、警察、军队精英、不安的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会这样一些群体的大量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学者并不熟悉这些群体的生活,而且,即使有的话也没有为进入他们的意义世界付出过多少努力。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在社会科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

对于不熟悉由各种客体组成的、属于一个个体或者集体的世界的学者来说,试图识别这些客体并不是一件简单或者容易的事。首先,这要求他具有使自己立足于这个个体或者集体的角度的能力。像其他任何一种潜在的技能一样,这种承担其他人角色的能力要求当事人的教养(cultivation)是有效的。总的说来,今天的学者们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受的训练与对这种能力的培养无关,而且,他们通常在调查研究活动中所经历的实践也不促进这种能力的发展。其次,为了识别人们集中关注的这些客体,当事人必须具有一批相关的观察。这些必要的观察很少是那些由诸如问卷、民意测验、量表、运用普查性调查研究项目、或者确定预先设计的变量这样的标准研究程序所得出

的观察。与此不同,它们都是以行动者们所作出的有关下列事项的描述性说明的形式存在的——他们如何看待这些客体,他们怎样在各不相同的情境中针对这些客体进行活动,以及他们怎样通过与他们自己群体的成员进行对话指涉这些客体。反过来,源于这些说明的这种对关键性客体的描述,又应当经历由这个既定的世界中那些见识广博的参与者组成的群体所进行的兼具探索性和批判性的集体讨论。为了防止个别说明所具有的那些为人们所公认的缺陷,这后一种程序是真正“必须做的事”。第三,正像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提到的那样,进行研究的学者和一般人一样,都受他们自己那预先确立的各种意象的束缚,因而很容易假定其他人也像他们这些学者看待这些既定的客体那样看待这些客体。学者们必须防止这种倾向性,充分地优先考虑对他们的意象进行审慎的检验。

所有这些评论都表明,如果有人认真接受所谓人们根据各种客体对于他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客体进行活动这样一种命题,那么,他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论研究。这种命题提倡各种与人们今天普遍认可和鼓励的那些研究有重大区别的研究。由于人们在其所有各种群体中时时处处都生活在由各种客体构成的世界之中,并且根据这些客体对于他们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进行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识别这些客体及其意义就是一个意义简单明了的问题。有关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取向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的。

(2) 符号互动论认为,群体生活是一个过程;当处于其不同情境之中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相遇时,他们就互相向对方指示行动线索并且解释其他人作出的种种指示。这显然意味着,他们各自的行为线索必须根据他们正在与之进行互动的其他人的行动线索而确定下来。这种互相根据对方调整不断发展的活动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处于面对面联合体之中的个体之间,而且也出现在诸如实业公司或者国家这样一些不得不互相打交道的集体之间,还出现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引导其行动线索的过程中考虑一个局外观众或者共同体之判断的时候。这种根据其他人的行动线索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即使

在最简单的观察中也是极其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发现要想理解社会科学家们为什么如此普遍地忽视它或者拒绝考虑它是很困难的。

这种前提所具有的方法论含义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它提出了有关人们今天研究和分析人类群体生活所遵循的绝大多数主要方式之有效性的最严肃的问题——这些研究方式仅仅把社会互动当作各种决定性因素导致行为发生所依靠的中介来处理。因此,社会学家们认为行为是由诸如社会角色、地位、文化惯例、规范、价值观、参照群体从属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均衡机制这样一些因素引起的;心理学家们则认为行为是由诸如刺激完形、有机体内驱力、需要倾向、情绪、态度、观念、有意识动机、无意识动机以及各种人格组织机制这样一些因素引起的。社会互动仅仅被当作这些各种各样的决定性因素把自身发展成为人类行动所使用的场所来处理。这些研究方式都严重忽视了以下事实,即社会互动本身是一种形构(formative)过程——处于互动过程之中的人们在形成他们各自的行动线索的过程中,不仅反映这些决定性因素,而且不断根据他们在其他人的行动中所遇到的东西引导、检查、改变他们的行动线索,并且改变这些行动线索的方向。在确立对人类群体生活和社会行动的各种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有必要严肃地对待社会互动。人们有必要把这个正在被研究的既定的生活领域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参与者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互相界定和解释对方的活动。弄清楚这个由指示和解释组成的过程如何维持、削弱、重新引导以及转变参与者们使其行动线索相互适合所使用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类型以下列前提开始发挥作用,即群体生活只不过是那些通过人们的互动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因素的结果,那么,它是无法被人们完成的。而且,人们根据这后一种前提组织的各种研究方式也没有研究社会互动过程的实力。一种不同的视角、一套不同的范畴以及一种不同的研究程序,都是不可或缺的。

源于认为人类互动是一个指示和解释过程的第二个重要的方法论含义是,强迫这种社会互动过程采取任何特殊形式都是没有根据



的。在社会科学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强迫都是一种显著的恶习。我们可以以下面这种离奇古怪的概念为例来理解它,即社会互动是一个发展“赞美性的期望 (complimentary expectations)”的过程——塔尔科特·帕森斯使这个概念得以广泛流行,并且使它为他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经过协调配置的社会系统的理论图式发挥基础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下列相反的前提中得到具体说明,即人类社会从根本上说是根据一种冲突过程组织起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存在于当前普遍流行的下列观点之中,即人类互动遵循“博弈论”的各种原理。任何一个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观察社会互动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认识到,以个体和集体的形式存在的人类参与者都以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形式互相应付对方的行动。他们有时互相合作,有时相互冲突,有时彼此宽恕,有时彼此漠不关心,有时在互动中遵守严格的规则,有时又参与互相针对对方的表现行为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游戏。认为所有人类互动(以及相应的,人类社会)都是以某种特殊的互动类型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种观点确实歪曲了只要人们想看就能够看到的互动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们互相针对对方作出指示,并且根据他们正在其中活动的情境互相解释对方的指示这个事实可以表明,社会互动过程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的形式。研究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学者的任务,是弄清什么互动形式正在发挥作用,而不是把某种预先确定的互动形式强加给这个领域。如果这种研究本身预设了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那么除非出于偶然,否则研究者就无法达到对这种正在进行的互动的识别。这里需要一种不同的研究程序。我的经验是,互动总是反复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其变化取决于进行互动的伙伴们所遇到的情境。无论情况究竟如何,社会互动的形式都是一个应当根据经验加以发现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应当提前加以确定的问题。

(3) 符号互动论所坚持的关于社会行动的观点,导致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论结论。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行动是由参与社会互动的人们所进行的个体活动和集体活动组成的——也就是说,是

由那些根据彼此的活动形成自身的活动组成的。这种活动构成了一个人类群体——无论这个群体像一个家庭那样小,还是像一个国家那样大——之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正是从这种社会行动观点之中,我们推论出我们用来从概念角度整理一个人类群体的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的各种范畴——其中的每一种范畴代表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或者一个方面。因此,一位首领、一位教士、一种社会角色、一种分层安排、一种制度或者一种诸如同化这样的社会过程,都代表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或者一个方面;除非人们最终根据社会行动来理解和系统说明一种范畴,否则这种范畴便毫无意义。从一种有根据的意义上说,社会行动是社会科学的第一主题,是社会科学及其各种分析方案所必需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准确地描述和理解社会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在前面刚刚进行过的对社会互动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勾勒出符号互动论所认为的这种关于社会行动的画面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必须把社会行动视为必然在社会互动过程内部发生。这幅画面的另一部分指涉参与者在社会互动中的活动——不论这种参与者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集体。换句话说,必须根据行动者来理解社会行动,因为只有行动者才进行活动。符号互动论的观点是,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是由他自己构造的;它并不单纯是对影响他的机体的那些具有引发作用的因素所导致的活动的摆脱。在这种意义上——正像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符号互动论是以与当前流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行动的。它认为行动者(让我先来讨论个体行动者)是一个面对他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情境的人。在这种情境中,他注意、解释、评估他为了进行活动而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事物。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进行互动或者沟通。通过这种自我互动,他构想他的行动线索,注意他所想要或者要求他付出的事物,确定一个目标,判断这种情境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预想他的行动线索。在这种自我互动过程中,他也许会搁置他所预期的活动、放弃它,在一个或者另一个关节点上检查它、修改它,或者设计一

种替代物来代替它。符号互动论宣布,这就是人们参与其社会行动所使用的方式。它邀请——这的确是一种恳求——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观察一番他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人并不是一种仅仅作出反应的有机体,他只不过是他的世界或者从他自己出发对各种因素的影响作出反应;他是一种不得不应付和处理这些因素的不断进行活动的有机体,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构造和引导他的行动线索。正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也许他在构想其活动的过程中做的工作收效甚微,但是他必须进行这样的构想。

同一种画面也适用于一个集体的社会行动,诸如一个商业公司、一个工会、一个军队、一个教会、一个少年团伙或者一个国家。这里的区别在于,集体具有一个发挥指导作用的群体或者个体,后者被赋予了评估这个正在运作的情境、指出人们必须处理的不同的事物以及制订一种行动路线的权力。一个集体的自我互动是以讨论、商议以及辩论的形式存在的。集体在以下几方面也 and 个体一样处在同一种地位上——不得不对付一种情境,不得不解释和分析这种情境,不得不构想一种行动路线。

关于应当如何研究社会行动,下列前提蕴含着大量内容,即社会行动是由活动单元(acting unit)通过注意、解释以及评估各种事物的过程和通过制订预期的行动线索的过程构成的。从根本上说,它意味着人们要想处理和分析社会行动,就必须观察构成社会行动所依赖的过程。当然,如果依赖所谓社会行动只不过是以前存在并且影响活动单元的各种因素的产物这样一种前提,那么,任何研究方案就都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里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论取向。与认为社会行动是一种产物、然后试图识别决定或者造成这种行动之诸因素的研究方式相反,这里需要的研究方式应当把活动单元视为面对它不得不处理的、正在运作的情境的东西,而且它必须面对这种情境制订出一种行动线索。这种研究方式使这个活动单元脱离了对于决定性因素的发挥使用来说是一种中性媒介的地位,并且把作为它的行动的主动组织者所具有的地位赋予它。这种不同的取向意味着,关

注一个既定的个体或者集体之社会行动、抑或关注一种既定的社会行动类型的进行研究的学者,必须从形成这种行动的无论什么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种行动。他应当以这种行动的实际形成所依赖的方式追溯这种行动的形成过程。这意味着,像行动者看待情境那样看待这种情境,观察行动者所考虑的东西,观察他如何解释他所考虑的东西,注意被预先设计的各种替代性活动,并且努力理解导致行动者选择和实施这些预想的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的解释。对于从经验角度理解社会行动——无论这种社会行动是青少年犯罪、自杀、革命行为、黑人勇士的行为、右翼反对派群体的行为还是其他什么行为——来说,这样一种对活动历程的识别和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

鉴于社会行动的形成过程就是经验性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一事实,所以,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在注意活动单元形成社会行动的这种过程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情愿——而且确实是失误——是令人惊讶的。这种失误是有关那些信仰一种集体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观点即认为社会行动是一种产物,人们应当跳跃到那些以前的、作为解释性理由的因素上去<sup>①</sup>——的学者的一个有趣的例子。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取向是,必须根据社会行动的形成方式来研究社会行动,它的形成过程与被人们视为这种社会行动之“原因”的以前那些条件是极为不同的,而且对这些原因的任何一种具体说明都没有涵盖这种形成过程。

---

① 由于没有看到和追溯社会行动的形成过程,所以,人们会不知不觉地犯许多严重错误。一个有关的例子是,由于某些被视为产物的社会行动案例具有相似的外表,人们就把它集中在同一个类别之中,然后推论说,由于这种相似性,它们必定具有某种共同的原因。就许多社会学家所偏爱的各种成见中的一种——即研究社会行为“发生率”,诸如自杀率——的成见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他们此后就努力通过说明这种社会行为发生率的变化来解释这种既定的行为类型。人类行为发生率所涵盖的各种案例都是有关社会行动的案例,其中每一个案例都一直具有由其各自的行动者形成它所经历的过程。回避对这种最主要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并且假定对这种发生率变化的说明包含了这种形成过程,这是最没有根据的做法。就人们所具有的关于这种发生率实际表现的东西的画面而言,认识这些既定案例的形成过程将会导致非常有趣的结果。

(4) 最后,我想对符号互动论观察人类社会之较大的或者所谓克分子的<sup>①</sup>部分抑或方面的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论作出某些论述。这些较大的部分或者方面构成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一直感兴趣的主要对象——各种制度、分层安排、阶阶系统、分工、大规模的社团单元以及其他大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学家们的倾向是把这些较大的复合体视为依靠它们自己的动力自行运作的实体(entities)。他们通常把每一个复合体都看作是由各种处于相互依赖性安排之中的既定部分组成的系统,而且这些部分都受属于这种系统本身的各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支配。今天极其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有关这种观点的一个出色的例子(尽管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根据这种一般的观点,处于既定的社会组织单元之中的参与者从逻辑的角度看只不过是与此种系统本身之诸力量或者机制的表现和发挥作用有关的媒介;人们为了说明所发生的事情便求助于这些力量或者机制。人们把这种既定的社会组织比喻为一架巨大的机器或者一个庞大的有机体(我这样说并无诽谤之意),因为它的行为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都应当根据有关这种社会组织本身之运作的原理来说明。

符号互动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较大的社会组织或者克分子单元。它认为它们都是对通过其各自的行动而相互联结起来的人们的安排。这种组织和相互依赖性就存在于人们在不同的关节点上安置的这些行动之间。参与者在任何一个关节点上都会面对其他人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且他们必须使他们自己的活动适合于后者。在各种不同的关节点上发生的这些行动所具有的一系列相互联系,构成了既定的克分子单元或者大范围领域的组织。就对这种组织所作的概略性描述而言,符号互动论与其他研究方式并无不同之处。然而,就把这种组织当作一种由各种行动组成的组织来看待而言,符号

---

<sup>①</sup> 克分子的(molar)是一个心理学用语,指不同于从微观的神经细胞分子活动出发解释行为之做法,而是从宏观的克分子活动出发解释行为的做法;因此,这里所谓“克分子的”意即“宏观的”。——译者注

互动论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不是根据各种组织原理或者系统原理来说明这种组织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活动,而是试图以参与者在其各自的关节点上界定、解释以及应付这些情境所使用的方式来作出说明。把这种关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行动的知识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幅有关这个有组织的复合体的画面。也许各种组织原理或者系统原理确实可以用来识别种种界限——超越了这些界限就不可能存在行动的一系列相互联系,但是,它们并没有说明这些相互联系系列的形式或者本质内容。的确,人们也许可以把从组织原理出发设想的一种既定的组织强加给一个社团单元或者社团领域,就像对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工业系统进行重组那样,但是,这表现的却是对某个人关于这种组织应当是什么的界定的运用。正像我们通过近来出现的惊人例子已经充分了解的那样紧随这种运用之后而出现的是某种另外的东西。符号互动论的观点是,必须根据处于大规模组织之中的进行活动的参与者,在基于其各自的角度处理这些情境时所参与的解释过程,来看待、研究以及说明这种组织。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种研究对于组织理论家或者系统分析家来说,将会在极大程度上阐明他们所关注的一大批问题——诸如士气、官僚制的作用、有效沟通中的障碍、贿赂的范围与腐败、“开发系统”(exploiting the system)、偏袒和小集团倾向、寡头政治控制的兴盛(与衰落)、组织的解体或者把新的活力注入组织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应当通过考察大规模组织和组织得很复杂的领域的生活(这种生活就像参与者的所作所为表现的那样),寻求有关这些组织和领域的知识。这并不像人们将会运用当前流行的措辞指出的那样,意味着离开克分子层次走向微乎其微的层次;它指的是根据这种克分子层次所具有的作为行动的一种相互联结的经验特征来研究这种层次。

对于符号互动论来说,使调查研究适合于对构成复杂组织或者构成组织得非常复杂的领域的人们之所作所为的研究,并没有提出与我们上面讨论的那些方法论问题不同的方法论问题。这里需要的也是我们在前面概括论述的那种探索和审视程序类型。然而,我想补

充值得注意的两点,它们与从把组织视为具有自己的原理的、自足的事物向把组织视为人们的活动的相互联系转变有关。

其中一点指涉我在前面指出下列内容时所评论的东西,即稳定的和重复出现的联合行动形式,并不以其固定不变的形式自发地发展下去,而是必须由人们赋予这种联合行动在其中重复出现的情境类型的意义来维持。这种评论也适用于大规模的组织。在具体说明一种行动类型——这种行动类型是处于组织复合体之中的人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关节点上都应当参与——的各种规范和规则背后,存在两种同时发生的过程;人们在这些过程中互相界定对方的视角,而个体则通过自我互动重新界定他自己的视角。这两个过程内部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规范或者规则的地位和命运;人们也许仍旧遵循这些规则,但是这种遵循却可能是不充分的或者有名无实的;或者反过来说,人们也许强化这些规则,或者为它们注入更多的活力。这些发生在支持规范和规则方面的转变,与运用制裁或者忽视对制裁的运用是两回事。它们指出了人们之间的互动中存在的一个单独的事件发生领域。有关组织的学术研究或者分析不能忽视人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互动过程,后者既是人们维持组织的原因,也是以其他方式影响组织的原因。

另一点是提醒人们必须认识到,联合行动在时间上与以前的联合行动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忽视这种联系,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理解联合行动的任何一种形式或者案例。把这种一般观点运用到有关大规模社会组织的论题上是非常合适的。组织理论家和系统分析家们在其研究和对各种原理的系统表述中,都引人注目地忽视这种历史联系。可以说,他们切断了复杂组织或者组织得非常复杂的领域与它们从其中产生的背景的联系。这样做只能导致颠倒黑白。人们形成和维持其有组织的组织的关系所依赖的各种指示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源于他们的过去的一种遗留物(carry-over)。对于学者来说,忽视这种遗留物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危险。在这一点上,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取向是——重视被研究的事物所具有的历史联系。

## 结 论

与本文的过于冗长相比,我的结论的确是简短的。可以把它表达成一条简单的指令:重视经验世界的本质内容,组织反映这种重视的方法论原理和取向。我认为,这就是符号互动论努力要做到的事。

(霍桂桓 译)